# 本期导读

本刊编辑部

为了弘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从今年第一期开始，本刊特设“国学讲义”专栏，第一期推出了《修身如玉待时飞——孔子儒行解析》（以下简称《孔子儒行解析》），得到众多读者的好评。《孔子儒行解析》介绍的是被称为“至圣”的孔子，对他的儒行的十七条论述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本期“国学讲义”栏目推出的，则是被称为“元圣”的伊尹。**《千古臣道第一人——元圣伊尹及＜尚书·商书＞五篇》**一文，从伊尹出山、伊尹的功德、伊尹的思想三个方面，对“元圣”伊尹进行了解读，特别是对伊尹的天意、德政、重民、勤政、明政、忠事等思想，进行了深入地剖析。

1949 年 4 月 23 日，在解放南京的隆隆炮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泰州白马庙正式组建，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启了海洋时代！在首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舰船里，有一艘舰船熠熠生辉，它的名字叫“黄安舰”。往前倒数 70 天，1949 年 2 月 12 日，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周密策划，黄安舰从青岛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之中，成功起义，驶向解放区——连云港，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海军的“第一舰”。李晗的**《访黄安舰起义亲历者》**为大家揭秘当时起义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公元 1817 年，李汝珍的《镜花缘》，在板浦书成。200 年来，关于李汝珍、关于《镜花缘》，研究不断，争论不断。特别是民国以来，胡适、鲁迅、郑振铎、吴鲁星、孙佳讯等关于李汝珍及《镜花缘》的研究，影响深远。近年，海州区板浦镇欲打造“镜花缘”特色小镇，将历史文化与休闲美食、乡村旅游融为一体，也算是对李汝珍及其《镜花缘》的纪念吧。我市明清小说研究专家李洪甫先生，对李汝珍的身世、官宦之路、《镜花缘》的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刻本，重新进行了梳理，以资纪念。详见**《再说李汝珍——纪念＜镜花缘＞成书 200 年》**。

丝绸之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的丝绸之路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分。而海上丝绸之路又有西方航线、南方航线和东方航线之分。**《徐福与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一文就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徐福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的开拓者、赣榆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的最佳起航点、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是中日韩三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纽带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述。

锦屏山，海州城里人都叫它“南大山”，最高峰海拔 427.7 米，在整个锦屏山系诸多山头中“挺拔高耸，如鹤立鸡群”。锦屏山古时称朐山，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朐山侧立朐县，东巡期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自此，海州朐山名闻天下。那锦屏山为什么叫“锦屏”？秦东门又在哪？锦屏磷矿、桃花涧、将军崖，这些连云港人耳熟能详的名词，构成了美丽的锦屏。老海州人韩世泳老先生饱含深情撰写的**《锦屏散记》**，给你不一样的“南大山”。

## 《连云港史志》编委会

顾　　问：(以姓氏笔画排列)
古龙高　刘畅征
许燕鎏　杨春生
李洪甫　张良群
张学贤　张树庄
张建民　彭　云
韩世泳

主　　任：苏中保

副 主 任：张　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　鹏

委　　员：(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一平　王　淙
王　滨　白植明
刘　鹏　邱仕明
张再楼　张　辉
胡卫星　姜龙才
郝　芳　戚盼德
韩翠林

主　　编：苏中保

副 主 编：张　斌　赵廷旗
陆瑞萍　魏　鹏

责任编辑：邱仕明　张伟敏
于冰清

文字总校：张骏鹏


# 目


## 国学讲义

04　臣道千古第一人——元圣伊尹及《尚书·商书》五篇　/鱼　禾

## 峥嵘岁月

8　访黄安舰起义亲历者　/李　晗

## 史志论坛

11　保护乡土文化 留住家园情怀
——乡镇志部门志编纂工作的思考　/韩翠林

## 地方文化研究

13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十一)　/刘凤桂

16　再说李汝珍
——纪念《镜花缘》成书 200 年　/李洪甫

19　林廷玉诗吟海州八景　/张树庄

22　徐福与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　/葛永明　杨桂珍

## 郁洲溯源

26　东山旧事从头说
——寻古云台十八村之二十　/伏广喜　闫祥富

# 录


29 栖云山之名探源 / 蒋金明

31 南北朝义塘郡诸县治所及辖境考 / 孙 铭

## 史海钩沉

36 历史上的济南盐场 / 蔡立志

38 智斗顽敌保军需

——记滨海军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庭抗争 / 祝新华

40 公章的由来 / 王 一

## 风物览胜

43 锦屏山散记 / 韩世泳

47 海州的观音道场

——九庵十八庙之二 / 孙大伟

封二:史志掠影

封三:古韵海州 诗赋名山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地 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69号

邮 编:222006

网 址:www.lygsz.gov.cn

电子邮箱:Lygshitan@163.com

电 话:(0518)85825137 85821368

印 刷:连云港市百草园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JS—G033号

出版日期:2017年4月

2017年第2期总第110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 臣道千古第一人

## ——元圣伊尹及《尚书·商书》五篇

鱼　禾

孔子被称为“至圣”，中国历史上能与孔子并论甚至超越孔子的，当数“元圣”伊尹。在河南嵩县沙沟龙头村的元圣祠有副对联：“志耕莘野三春雨，乐读尼山一卷书”。上联说的是伊尹事耕桑于莘野，下联是说孔丘著书于尼山。可见古人是把伊尹和孔丘等量齐观。

以“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综合而论，伊尹应是千古臣道第一人！

从为帝国建立功勋来说，伊尹当与周之太公吕尚比美。荀子在其《臣道》中把伊尹与太公并列为“圣臣”，“得一人而王天下”；从辅政、摄政、还政到教导接班人来说，也只有“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周公可比，况周公摄政还有其兄弟召公怀疑管叔、蔡叔造反。“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苏轼《伊尹论》)伊尹以臣放君，就是“流放软禁”，天下人包括太甲自己都没意见。可见伊尹手段作为何其高超！

那么伊尹何许人？为何没有上面三位名气大？

### 一、伊尹出山

伊尹，小名阿衡。生于公元前 18 世纪末至公元前 17 世纪初。一般意见认为，阿衡(也有作保衡)就是伊尹，伊是姓，尹是商汤封他的官职，部分古籍称呼他为伊挚，故而其名可能为挚。其人不仅在先秦古籍中经常出现，而且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金文中都有记载，是商朝一位声名煊赫的大臣，甚至商王室尊敬地把他与开国君主大乙(即成汤，也作天乙)并列一起来祭祀。可能是年代太久远，史料太少，也许是薄古详今的宗旨，按说以他的事功，太史公至少应比照周公太公以世家或诸子列传予以旌表。然而终究没有单列，只放在《史记·殷本纪》中简单处理。缺少太史公的妙笔生花，即使是“元圣”也其名不彰。

伊尹是哪里人？有洛阳嵩县说，有山东曹县说，史料无法确切证明，只知道他是有莘氏陪嫁到商国来的媵臣，就是奴隶。商代以前，有莘氏基本聚居在陕西合阳一带，是大禹的母族。有关伊尹的来历以《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本味篇》记载最为详细，“有侁(shēn)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伊尹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於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就是说伊尹是个被遗弃的孩子，让一个采桑女在桑地里捡到，由君主交给一烧饭的抚养，长大后很贤德。商汤听说后想要伊尹，伊尹也想去，而有侁氏不给，最后商汤通过娶有侁氏女，伊尹作为陪嫁，商汤方才得到。《吕氏春秋·本味篇》后面还用了大段的笔墨渲染伊尹借讨论做饭烧菜的烹饪技艺与商汤切磋治国之道。

当然《吕氏春秋》这里是用来支持其招贤立论的论据，不能完全当真。

屈原《楚辞·天问》说“成汤东巡，有莘爰极(及)，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屈原这段诗文的意思是，商汤是在巡视东方时和“有莘氏”建立了联系，怎样得到地位卑微的小臣伊尹呢？是托了迎娶旺夫贤内助的福。不同于前面的有莘氏西方说，屈原以为是成汤巡东方而得伊尹，虽意见不同，却佐证了伊尹的媵臣身份。

尽管《孟子》讲“伊尹耕于有莘”，讲了很多孟子的事迹，《墨子·尚贤》记载“伊尹为有莘氏女师仆”。最终还是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定论。《史记·殷本纪》“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认为伊尹第一可能是陪嫁的厨子，背着鼎以烹饪讲王道；第二是处士，被成汤多次诚聘出山。伊尹早年究竟是干啥的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被商汤重用，成为“帝王之师”，对建立和巩固商朝贡献至伟。

至于说伊尹是厨神和汤药鼻祖从上记载应该是成立的。

**二、伊尹的功德**

（一）“伊尹间夏，以乱夏政”，这是几乎所有古籍一致认同的大功。

《古本竹书纪年》说：“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伊尹经常深入夏朝统治区，刺探情报，鼓动造反，以其高超的手段接近并成功策反夏桀末喜。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汤夏之争，未战胜负已分。此事古籍记载甚多。

《国语·晋语》亦云：“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

两处记录虽不是官书正史，但都说到伊尹凭借自己的本事，得到了夏桀王后末喜的宠幸，从事搜集情报，离间国人及夏工作是肯定的。

《孙子兵法·用间》也把这事作为经典案例提及：“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

《尚书·商书》的《汝鸠》与《汝方》两篇虽然正文佚失，但其序文提到：“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证明伊尹离开商住地亳到了夏，对夏不满意，又回到了亳。

《史记·殷本纪》的说法类似于《尚书》：“汤举任伊尹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即丑有夏，复归于亳。”很明显，伊尹多次深入虎穴，而且还把王后未喜策反了。《孟子·告子下》云：“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鬼谷子·忤合》也说：“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所明，然后合于汤。”这里“五”我们只能看作是虚数，多次的意思，即伊尹多次立场动摇，反复纠结之后才最后决定为商汤效命。实际上以伊尹的志向和信誉，只能是出生入死的间谍祖师！

（二）“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诗经·商颂·长发》），就是说辅佐商王政权是第二大功劳。

先是作为成汤的政治助手和军事参谋夺取政权。清华简《伊至》记录了伊尹与商汤相会并盟誓以及灭夏之战的事情。这是篇比较可靠的文献。文献讲到：“惟尹自夏徂白（亳），禄至在汤。汤曰：‘格，汝其有吉志。’尹曰：‘后，我来越今旬日，余微。’”（以下引文略）伊尹从夏赶往亳去见商汤，告诉了商汤夏王国内部的混乱情况并商量下步行动方案。两人最终盟誓灭夏，于是彼此心安并安排祭祀禳（ráng）灾事宜。汤带兵出征攻城略地，伊尹做他的参谋并妥善处理占领区的行政事宜。《汉书·刑律志》伊、吕并书，称赞其治国和军事才能。杜甫诗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咏怀古迹五首·其五）讲伊尹功劳与周太公吕尚差不多，高于汉之萧何、曹参。从而商军在亳都以西的军事行动很顺利，沉重打击了夏王国。

除了颠覆夏王国之外，伊尹在安定新朝政局方面的功劳更卓著。《史记·殷本记》：“汤既胜夏，伊尹报。于是诸侯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成汤打败夏后，如何让其他诸侯归顺是政治大事。此时伊尹通报各家，说服其甘愿称臣，免不了说大义、晓利害，如此成汤方坐上天子大位。同时也说明了伊尹在诸侯中的影响，周代的青铜器金文屡有记载，其地位介于成汤与先公之间，春秋时叔夷还颂扬他“伊少（小）臣佳辅，咸有九州，土禹之堵”（《叔夷钟》铭）。赞扬伊尹小臣辅佐商汤取得天下。伊尹帮助商汤东征西讨，把氐羌之族震慑得“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曰商是常”，没有人不敢来称臣、供奉。商汤去世后，伊尹还辅佐过外丙、中壬两届商王。

（三）“太甲居桐，盛德阿衡”（《史记·太史公自序》），伊尹最大的功绩莫过于放太甲于桐宫。

中壬在位四年死后，伊尹立太甲为帝。《史记·殷本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伊尹先立太甲为帝，看到太甲乱来就流放软禁桐宫，让其悔过反省三年。

其间伊尹独掌朝政，认为太甲改好了就迎回太甲，还政于太甲，最后观察太甲确实不错，受到诸侯及百姓认可当即归隐。归隐地传说是连云港市灌云县的大小伊山。急流勇退的高人风范在专制社会背景下少之又少，知道的也就归政成王的周公、古罗马大独裁者苏拉、南美解放名将何塞·德·圣马丁将军等寥寥数位，更多的则是贪权栈位并最终身败名裂的庸碌之徒。

（四）“先觉觉后觉”，儒家经典中更推崇的还是伊尹的帝师之功。

《孟子》说：“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可见伊尹又是我国第一个帝王之师。伊尹教给商汤一些什么知识呢？《孟子·万章》篇说伊尹“以尧舜之道要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史记》中“滋味说汤”，“言素王及九王之事”等，都是教给成汤谋划灭夏的方略和治国驭民之道。孟子述伊尹语：“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并自称：“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子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伊尹以先知先觉自居，把自己的话视为最高教义用以教育人民。伊尹的志向是不把“匹夫匹妇”教成尧舜，就等于是把他们推下山沟。这正是儒子们的向往。传说伊尹中高寿一百岁，作为 3700 年前，历经五朝的伟大政治家，他的实践和理论总结为殷商 640 多年的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伊尹的思想

伊尹究竟有什么样的王道呢？其治国思想主要体现在《尚书·商书》五篇中。《史记》中明确记载伊尹的著作有《女鸠》《女房》《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徂后》以及《太甲》三篇共九篇。而《尚书》只收了五篇，丢失了重要的《肆命》《徂后》《女鸠》《女房》。至于现《尚书》其序中明言，孔子举“九丘坟典”凡百篇成《尚书》。秦焚书坑儒后，西汉伏生（胜）记诵二十五篇，后在墙壁中发现蝌蚪文本加以对照，总之是七拼八凑成五十八篇，免不了留下汉人的思想、观念和语言风格，以至后人多以作伪。而《咸有一德》司马公说汤建国初“伊尹作《咸有一德》”，现《尚书》却云伊尹复政告归前“陈戒于德”。《伊训》的成书时间、成因也有出入。这里我们均按现《尚书》理解。

《伊训》的内容主要反映伊尹在王室祖庙前，告诫年轻的王位继承者太甲做天子要立德立功、从善如流、远离声色娱乐与奸佞小人、扬善弃恶，从而确保江山永固；《太甲》连续三篇，第一篇是讲“幽禁太甲”原由，第二篇是伊“迎归太甲”后的君臣对话，重点是伊尹交代太甲要向先王学习，恪守王道；第三篇是伊尹退休前对太甲的工作交代；《咸有一德》就是最后要求太甲坚持“一德”。概括起来，五篇文章主要思想如下：

1、天意。这里与墨子“天命”思想相通。似乎与基督教及佛教的宗旨目的有相似用意。伊尹和墨子以及先哲们都明白，帝权无法节制，自觉是靠不住的。当然，古时候科技不发达，人们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就相信有超越自然的力量“天”“神”存在。通过天神可以制约帝王的滥权和妄为。今天，我们批判其唯心主义，其实有可能是忽略了他们的真实用意。

《伊训》中，伊尹总结夏政权巩固是因为其先王们“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努力推行德政，才没有天灾，山川鬼神都很安宁。其失去政权是“子孙弗率，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他的子孙不按先王的法度干，胡乱作为，上天降灾，借助我们的手法讨伐他。告诫太甲说：“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说老天爷要用降百祥奖励作善者，降百殃惩罚作不善者。“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太甲》上)，讲上天看到了成汤的德行美好就把使命交给他，以安抚天下。伊尹用天命、人事、祸福对太甲申戒，抬出皇天以先知先觉的天意代言人教育太甲，借天之威，给君权涂上神授的色彩，增加政权的合法性以统治百姓。

2、德政，即纯一之德。伊尹一方面用君主若不从天意，天必警以祸殃的思想教育太甲，另一方面他更看重人，特别是帝王的道德修养。在《太甲》中篇中，伊尹通过太甲反省的认识说：“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dǐ）不类”，“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huàn）（逃）”。强调一切是我个人无德。伊尹申诰太甲说：“惟天无亲，克敬惟亲”(《太甲》下)。意思是说，只有自己克敬、克明、克诚，才能取得臣民的忠和亲。他还说：“天难堪，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漫神虐民，皇天弗保。”(《咸有一德》)意思是说老天爷是难以相信的，命运

也是靠不住的。只有常于有德;才能保住王位。否则统治九州的权利就要失去。如果轻漫祖先和神灵,虐杀老百姓,皇天也保不了你的王位,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眷求一德”。

“一德”就是纯一之德。在《咸有一德》中,伊尹用夏朝所以灭亡是因为“夏王弗克庸德”,商汤所以能代夏而立是曲于汤王“眷求一德”。商称王天下,不是苍天偏爱商王, 而是老天爷保佑有德的人,不是商王哀求于老百姓,而是老百姓愿意归顺有德之王。在伊尹看来,失德则失天下,求于一德,则能得到天的佑助而得天下。帝王的修德、修身,关乎国家存亡兴衰。

“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就是说谁能积众善之德,谁就可以为师。对于德和政的关系,伊尹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意思是说德、政是否修到以德兼众善以一贯之的程度,这要从万民是否悦服今王和后世是尊祀七庙上得到验证。可见伊尹主张德政。

3、重民。民意即道。五篇文章中,没有专讲“民”,但始终不离“民”,所谓“王道”“一德”基础都是“民”。商王夺取政权是因为“代虐以宽,兆民允怀”(《伊训》),因为对百姓宽仁,所以得到民众的怀念。“先王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悦。并其有邦厥邻,乃曰:‘徯(xī)我后,后来无罚。’”(《太甲》中)伊尹告诉太甲,成汤在夺取天下时,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穷苦百姓,百姓都服从,没有人不喜欢,以至于没有打到地方的百姓都盼望。告诫太甲“无轻民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太甲》下),使用民力要思其艰,居安思其危。

最后在《咸有一德》中讲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后”指君主,说君主离了百姓就无人可用;民众没有首领就干不好大事。不能让普通百姓人尽其力、各畅其意,帝王什么功德都没有。体现了伊尹辩证的历史观,既告诉帝王要重民意,同进也要求百姓孝忠君王。

4、勤政。勤于政事而力戒奢靡享乐之风。伊尹告诉太甲:“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帝求俊彦,启迪后人,无越厥命以自覆。”(《太甲》上)意思是你先祖天不亮时就坐等天亮操劳国事,广求才俊辅佐教育后人, 不要丧失祖上留下的权力使命而自取灭亡。要“慎乃俭德”,“无时豫怠”,不享懒惰。

勤政的同时,必须力戒“三风十愆(qiān)”即“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伊训》)总是在宫廷内歌舞是巫风、贪求财物女色是淫风、迷恋游猎为乱风,侮圣、逆忠、远德者、亲小人,三种风气十项过失卿士有一丧家,邦君有一国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如果做臣子的不去匡政,处以墨刑!

5、明政、忠事。“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伊训》),就是说要求居上的商王要克诚克明,明断是非; 居下的臣民对君上要克诚尽忠。君怎样做到“明”?

一要“时乃日新”(《咸有一德》)。就是说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意识, 处于时时追求新的状态中。二要“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主张尊贤、用贤,自己左右臣子要用合适的。三要“从谏弗咈,先民时若”(《伊训》), 听取好的建议, 顺从前贤的主张。“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弗虑胡获? 弗为胡成? ”(《太甲》下)称量建言的标准不是自身的感受,合不合心,都取决于“道”,要认真思考,做事才能成功。四是“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太甲》下)。君王做表率,天下风气就正。五是“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修身”用人的原则是不求全责备, 对自己则要经常检点不及他人处,做到自我完善。

作为臣子“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咸有一德》)。就是做大臣的要上对天子负责,下保庶民安定,不怕困难,谨慎团结,始终如一。

最后 “君罔以辩言乱旧政, 臣罔以宠利居成功”, 做君王的不要听信巧言伪辩搞乱了有效的德政;臣下不要由于恩宠利禄而居功自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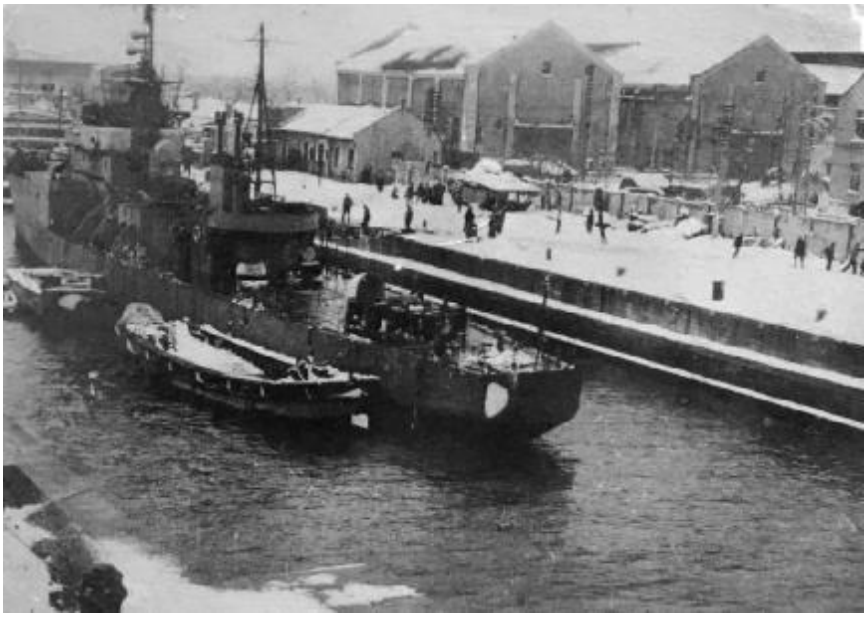
伊尹的这些思想,千百年来,都受到历代有为君王的称许,并得以完善和弘扬,今天来看,也很有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办)

责任编辑 张伟敏

# 访黄安舰起义亲历者

李　晗



到达解放区后的黄安舰(张云庭拍摄)

黄安舰,原属日本海军,原舰名“海防 81”号。1945 年刚刚下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接收时依接舰顺序编号,称其“接 22”号,编入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一舰队后,正式命名黄安舰。1949 年 2 月 12 日,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周密策划,国民党海军黄安舰在青岛成功起义,成为中国人民海军的“第一舰”。紧随其后,包括“重庆”号巡洋舰在内的 97 艘舰船陆续起义,起义官兵 3800 多人,约占国民党海军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极大地影响了国共两军的士气和解放战局。

随着时间的流逝,黄安舰起义的亲历者大部分已相继离世。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尚健在的仅有现年 96 岁的张大发、85 岁的张大同兄弟俩以及 95 岁的张云庭三位老人。近日,市革命纪念馆口述史摄制组前往青岛,采访了三位老人。通过采访,佐以资料,重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47 年 8 月 30 日,黄安舰驶入了青岛港。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黄安舰和其他日本赔偿军舰基本都停在船厂。张大发时任黄安舰轮机部轮机员,目睹了当时的情况。张老告诉我们,这些军舰遭到了日本海军和国民党海军不同程度的破坏,必须大修。

在这些军舰进入船厂检查维修时,国民党海军各舰的负责人把军舰的维修工程当成了牟利渠

道。当时最为紧俏的发电机，在军舰上明明是完好的，却被列为损坏部件拆下来卖掉。张大发说，不少军舰进船厂不久就被拆得仅剩一个壳子。然后这些海军的军官再组织维修，从中又大赚一笔。这也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渗透提供了机会，一场酝酿在内部的变革蓄势而发。

张大发，1935 年参加国民党海军，在一艘小炮艇上当勤杂兵。1938 年日军占领青岛，他随着部队上岸。日本投降后，他回到了海军。1948 年，被调到“接 22 号”黄安舰上担任少尉轮机员。

据张大发回忆，黄安舰的中尉舰务官名叫鞠庆珍，他兄弟 5 个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其中一个哥哥名叫鞠庆玺，1948 年 10 月因地下工作人员的身份暴露被杀害了。鞠庆玺生前对鞠庆珍影响很大，而张大发和鞠庆珍是结拜兄弟，所以思想上也受了很大影响。

这时，事先已接上头的（准尉枪炮军士长）王子良、（少尉枪炮管）刘增厚、（上士枪炮班长）孙露山借着到鞠庆珍家中慰问的机会，彼此表明了心迹，亮出了各自的身份，从而形成了起义的领导核心，继而分别向胶东军区联络部和中共青岛市委作了汇报。制定了起义计划后，四人分头联络，争取了更多的起义骨干。

作为鞠庆珍结拜兄弟的张大发负责轮机部。张老回忆说：“他们提出让我再找几个可靠的人在轮机部里帮我。我找了三个，一个叫黄兴湖，与我一个大队的，是四川人；一个叫张金诺，他大哥是我的班长；还有一个叫安守志，记得这个小孩一说话脸就红，很招人喜欢。我就把这三个人的名字报给鞠庆珍，鞠庆珍也同意。以后我们一块开会，推选鞠庆珍当起义总指挥。接下来就是选起义的时间了，怎么办呢？过年的时候，鞠庆珍让我到舰长家里去拜年，也代表他给舰长拜年，同时打听我们军舰的事情。1949 年 2 月 12 号，那天是正月十五，我们临时开了个小会，决定当天晚上起义。鞠庆珍宣布起义时间定在晚上八点半。决定起义就要事先做一些工作，我又上了轮机部把舱面上的舱门在里面关死，这样别人就不能从舱面上进去，只有我们从舱里的小圆门那儿进去。鞠庆珍还特意发给我一支手枪。那天因为过节，舰上要派人上岸买一些糖果，准备开文艺晚会。我们就决定借着晚会，把所有人员都集中到舱里面去，并把舱盖盖死，无法从里面出来。”

谋定起义的当天下午，上等兵张云庭按照孙露山“晚上有事，早点回舰”的个别交代，太阳还没落山就回来了，从孤儿院来陪哥哥张大发“过节”的 16 岁少年张大同，还被高度警戒的鞠庆珍盘问。当得知是结拜兄弟张大发的弟弟时，才让其登舰。由此张大同就成为参加黄安舰起义和人民解放军第一批海军的最小战士。

“晚八点半，按照计划，我带着人控制了轮机部。八点四十分，鞠庆珍下命令给轮机部，发动机器！开始前进！装满物资、弹药的“黄安舰”，从停泊处缓缓起航。”

“行程并不像计划的那么顺利，刚起航不久便遇到了麻烦。”据张大发回忆：“当时青岛前海停泊着四艘美国军舰，大的近万吨。黄安舰在美军军舰中穿行时，一艘美国军舰发灯光信号询问，你们想

张大发(96 岁)、张云庭(95 岁)、张大同(85 岁)接受采访

干什么?你们上哪儿去?鞠庆珍告诉通信员,回答美国兵说我们的船小,要到山后面去避风。因为黄安舰体积较小,只有美军军舰的十分之一左右,抗风浪能力确实不行,美国人就相信了,就这么样'混'过去了。本来我们开会的时候说是去石岛,起义以后又改变路线了。改变路线的事情我确实不知道,我在轮机部嘛。当夜,我一宿都坐在电话室。"

早在起航前的会议上,大家已商讨好,船上可能有些人对起义持不同意见甚至反抗的情况。晚上8点,按照事先约定,王子良、刘增厚先将副舰长刘振东等人扣押起来,交由王子良夫人袁丽峰等持枪看守,张大同就负责随时报告被看守者的情况。

航行途中,通过做工作,取得了副舰长刘振东等关押人员的理解和支持,许多官兵不但不反抗,反而主动要求参加起义。

"由于时间仓促,事前的联络工作没有做好。当时驻连云港的解放军部队并不知道黄安舰是前来投诚的,解放军大炮的炮口迅速瞄准了靠向码头的黄安舰!起义军舰到连云港以后,我们把探照灯都打开了,意思是告诉解放军你别打炮,我们是起义的。结果解放军还是打了炮。我听着是打了七炮,我弟弟说是打了八炮。我们后甲板带了56桶油,只要挨上一炮,整个军舰就都完了。王子良匆匆跑回舱房将床单扯下作为白旗升上了桅杆,来自岸上的炮火也随即停止。"

据张云庭回忆:"他们几个水手乘小艇上岸拴缆绳时,每人身后都跟着一名"高度警惕"的持枪战士,令他们十分紧张,唯恐哪个动作不当引来走火。"

随着天空放亮,真相大白,解放军派人帮着把船上的物资运下去。解放军首长开玩笑说:'哎呀,你们来我们很欢迎,打着礼炮欢迎你们!'上岸后,全体"黄安舰"成员欣喜若狂,站在舰艇上合影留念。

黄安舰抵达连云港的第二天,即2月14日,新海连特区党委书记谷牧接见了黄安舰起义领导人员,接着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黄安舰起义全体人员参加了大会。

黄安舰起义后,国民党连续两天派出多架飞机到连云港码头侦察、轰炸。由于当地解放军部队配合黄安舰警惕地反击、保卫,未被击中。随后,奉华东军区前委指示,黄安舰转移到苏北燕尾港堆沟(即陈家港)码头,伪装隐蔽。之后,国民党空军又多次到燕尾港一带寻找,均未发现,黄安舰才得以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1950年4月23日,黄安舰被命名为"沈阳"号。后来它参加了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在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中,曾近岛火力支援。在与国民党海军的作战中,它与兄弟舰艇一起击沉击伤了大型炮舰"太平"号和其他多艘舰艇,为解放战争立下战功。

张大同回忆说:"黄安舰起义时,虽然我年龄是最小的,但后来我在舰上服役的时间最长。舰上的战友是分为几批离开的,第一批是哥哥张大发带了四五个人被分配到南京学习;第二批,也是大部分人是在1955年离开的;后来的几年陆陆续续的走,到了1959年,只剩下我和鞠庆珍2个人了。"张老很怀念在舰上的日子,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几枚炮弹碎片,那是一江山岛战斗中,敌舰打在沈阳舰上的炮弹,张老把它们收集起来,悉心看管,保存至今。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

责任编辑　邱仕明

张云庭捐赠的文物:左为新海连特区警备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的起义证书,右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的四等功证书

# 保护乡土文化 留住家园情怀

## ——乡镇志部门志编纂工作的思考

韩翠林

改革开放以来，灌南县的机构几经调整、乡村多次撤并、园区规模拓展、城乡联袂开发，使原有的社会形态、经济业态、人文语态、地理状态都发生急剧变革。如何保存这段传统的乡土文化、留住民众的家园情怀？我们认为开展乡镇志部门志编纂，既是传承历史文化、保留乡愁记忆的最佳途径，也是当代人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和崇高使命。

### 一、乡镇志部门志编纂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 编纂乡镇志部门志是赓续历史传统、服务地方发展的现实需要

乡镇和部门是一个地方的根脉所在，大到生产方式、社会规范、宗族文化、民风习俗，小到一条路、一座桥、一口井、一道菜都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和丰富的传统记忆。当前，全省各地正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积极开展特色小镇、特色产业建设。灌南县新安镇、堆沟港镇、汤沟镇经过多年的发展，都有独具特色的人文内涵、民俗风情、产业优势和旅游功能，并获得国家级表彰；堆沟港镇、田楼镇和新集镇步入2016全国综合实力千强乡镇，业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编纂乡镇志部门志能为这些工作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其实志书编修过程就是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人物等全面普查梳理的过程，它不仅立足于存史，而且在历史传承、县情教育、旅游开发、招商引资、城镇建设等方面将发挥独特作用，且必将成为宣传和开发灌南的靓丽名片。

(二)编纂乡镇志部门志是弘扬地域文化、留住乡情乡愁的基本载体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步伐，灌南县政区变动频繁，传统的乡镇、村落正不断消失，城市化率达到47.2%，建成农民集中居住小区85个。据统计，全县乡镇由1987年22个减少到2016年11个、村

灌南海西公园

(居) 由 326 个减少到 238 个，分别减少了 50%、27%，一起被掩埋的还有世代积淀的文化与风俗、与生俱来的习惯与信仰、无法释怀的乡情与乡愁。在一个同质化越来越高的时代，只有守望乡土，才能让人们找到心灵的港湾、精神的家园；只有记住乡愁，才能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坚守。编纂乡镇志部门志，不仅有利于灌南地域文化的抢救保护，而且为记录乡音乡忆、留住乡情乡愁提供基本载体，也便于培育民众爱家爱国的情怀。

（三）编纂乡镇志部门志是建设美丽乡村、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借鉴

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要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基础”“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的建设路子，注意农村味道，体现农村特点，记得住乡愁，留得住绿水青山”，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大力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加快美丽宜居村庄建设，着力培育一批有特色的美丽乡村”。这些都为美丽乡村建设指明了方向。修志通古、以志鉴今，编纂乡镇志部门志，不仅可以梳理全县文化展衍脉络、刻录时代发展印记，而且还能为探索美丽乡村发展路径、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历史智慧与经验借鉴。

**二、乡镇志部门志编纂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修志在很多乡镇、部门中存在“四不”现象：一是对地方志工作认识不足，不想编；二是志书专业性强，不会编；三是资料保存不完整，不能编；四是编纂工作量大，不敢编。

（二）对策建议

面对这些状况，我们认为只要各级党委政府按照“一纳入八到位”要求，周密部署、因势利导，从全县层面上加以推进，定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提升认识高度。**中国自从有了地方志以来，历朝历代都把它当成国家行为，官责官修。到了明清时期，更由朝廷反复颁布修志诏谕。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工作”“把历史和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和 2015 年对地方志工作分别作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和“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的批示，这些都凝结着中央领导同志的厚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做好地方志工作的根本遵循。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明确编纂进度。**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提出地方政府要“指导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省委省政府“十三五”规划都要求“加强地方史志研究”，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江苏省贯彻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实施方案》把推进部门、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志书编纂作为一项重要的目标任务，并制定相关制度和规范。市政府提出“三年过半，五年完成”的编纂工作目标，这为推进乡镇志部门志编纂工作提出了刚性要求。2016 年 3 月，县政府办根据市里的统一要求，印发了《关于做好乡镇志部门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并确定 5 个乡镇和 20 个部门为前期编纂单位，要求 2017 年底前完成志书编修任务，其他乡镇和部门着手资料征集和人员储备，确保“十三五”期间实现全县乡镇志部门志全覆盖。各级领导只要明确从业一行、为官一任、守土尽责和以志存绩、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历史意义并付诸实践，再大的困难和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加大保障力度。**编纂乡镇志部门志工作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政策性强，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委会组织实施、专家参与的工作机制，上下联动、各方支持、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县政府要成立领导小组，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并对重点环节、重点单位加强专项督办和检查。各乡镇和部门也成立相应机构，明确专人负责，加强对修志工作的组织领导，并动员和组织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以及知情人、当事者参与其中，并为编纂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撑。县地方志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和编纂审核工作，配合各乡镇、各部门共同完成修志任务，努力发挥地方志工作在服务“强富美高”新灌南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作者系灌南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　于冰清

# 连云港历史沿革史话(十一)

## ——隋唐五代时期海州地区州县行政建置(上)

刘凤桂

隋唐时期，中国结束了二百多年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到贞观、开元、天宝之际达到了盛世。政区建置也顺应了这一历史前进的潮流，三级行政建置从隋初开始到唐前期终于形成固定的政区建置制度。中期以后，唐代的节度使制度，则是在州县二级行政建置之上设立的中央实行行政管辖的派出机构，藩镇与节度使实为一体，直接影响到唐中期以后的政治格局，海州也未能处之度外。

一、隋代对政区行政建置的改革

公元 581 年隋文帝杨坚篡周，建立隋朝，定都长安。589 年灭陈，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 280 多年的长期分裂局面，中国又重新复归统一。隋文帝继承了北周的疆域遗产，以大业五年(609)平定吐蕃谷浑更置四郡为计，版图“大凡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隋书·地理志》)后又有所拓展，至大业八年(612)计，北置辽东郡于辽水西岸建通定镇(今辽宁新民东北)；大业五年平定吐蕃谷浑建海西、河源(今青海北部)、鄯善、且末(今新疆若羌、且末)四郡，大业六年所置伊吾郡(今新疆哈密)；北承北周之旧抵五原郡(今内蒙后套)，南仍以日南郡南界横山接林邑国境；又在南海分置珠崖、儋耳、临振三郡。至此，隋建立了疆域辽阔的封建大帝国。

随之政区建置也发生了变化，文帝开皇三年(583)，废除行政区划中的郡一级建置，将自秦汉以来施行了近六百年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有时是郡)统县的二级制。汉晋时平均每州领八九郡，每郡领八九县。至南北朝后期，州增至二百五六十个，郡增至六百有奇，而县数仍千五六百。废郡以州统县，无疑使州(隋炀帝于大业三年改州称郡)一级所领县的数量增加，有利于政令贯彻和赋税征收。从此，过去几百年上下两个不同级别的政区名称，变为同一级别的不同时期名称，沿袭至唐以后各代未改。隋代的这次政区建置改革，实际上是对西晋末年至南北朝分裂时期各地因战乱而割据自立、或流亡侨立造成的州郡建置混乱局面的纠正，减少了中央政府行政统制的中间层次，保证政令畅通，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变化。但因为改革总是会在新政与旧政选择之间踌躇不定，其间稍有反复亦属正常。

弄清了上述这一历史背景，我们就可明白隋代连云港地区建置在州与郡之间反复变化的原因了。如文帝开皇三年(583)“罢郡为州”，朐山降为县，但隋炀帝大业初，海州复又领朐山、羽山两郡，朐山与海州郡、州同治。又，开皇三年，裁废东海郡，立海州，同时裁废义塘郡，以归义、义塘二郡入怀仁县，基本包括了今赣榆全境；原建于云台山上的广饶县于文帝仁寿元年（601）改为东海县（今南城镇）。

隋是一个短命王朝，立国仅二十几年就被农民起义和割据势力所灭亡。隋炀帝末年，海州地区先后爆发彭孝才、卢公暹、杜雍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617）又有蒋宏度、臧君相分别割据东海（今云台山）和海州，隋在海州地区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二、唐代都督府和道的设置与海州的行政区划**

公元 617 年，隋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炀帝无嗣，安后立代王杨侑为帝。618 年，李渊逼杨侑禅让，改国号唐，是为唐高祖。时天下仍纷扰不断，高祖致力于削平隋末以来的地方割据势力，到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完成统一。但在如何处理地方与中央关系，即实行直接管理还是间接管理方面却始终犹豫不决，地方政区建置的省并与析置颇为频繁。早在武德初，即普改天下郡为州，由于增析州县颇多，后来数州合置一总管府以统军戎。时在海州设总管府，总管海州东海郡的朐山、东海、沭阳、怀仁四县军戎，同时还统管沂州、楚州军戎，兼理行政。武德七年（624）改总管府为都督府，乃军政合一性质的州级以上的行政建置。到了太宗贞观元年（637），以天下山川行便，分关内、河南、河东、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海州属河南道统辖的都督府。道这一职能，其实早在西汉武帝时就曾设立过专门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道，隋炀帝也曾设立道来管理北方军事和行政事务。唐代道制改革总的趋向是向中央集权、分级管理方向发展。高祖、太宗两朝三十多年，经历了台省制、都督府制和分道巡察制度的依次选用过程。唐代海州行政建置也经历了这一过程。

但在制度创新上，唐初却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基本是因袭魏、隋旧制。虽然都督制一直实行，却没有发展成新的高一级的政府行政单位。到后来，都督制已经淡化为军政合一性质的地方行政化机构，在行政级别和职能上与州没有多大的不同，尤其是州刺史同时兼任都督的州，海州即是其中之一。至于道制的实行，它始终是一种中央虚设的地方管理巡察单位，而不是一级政府组织机构。据此两方面分析，唐初的海州行政实体拥有较大的行政权力。到了睿宗、玄宗时代，实行道制改革，最终建立了中央集权，分级管理的三级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海州的行政管辖权也未见削弱。

**三、节度使制度下的海州**

唐高宗、武后时期为了加强对吐蕃、突厥等“四裔”的防御，屯戍军的设置逐渐制度化，形成有固定驻地和较大兵力的军、镇，且皆各自置使，行军大总管也逐渐分为统率诸军、镇的大军事长官，长驻专任的节度使也就应运而生了。到睿宗景云二年（711）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唐代的第一位节度使诞生，继之开元天宝之际增至十节度。节度使作为军事主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的民政权，然发展到后来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亦均受其所节制，有的还兼任驻在州的刺史。他们虽然形式上接受唐政府的诏封，但在军事和行政运作上却不受唐政府约束，渐而形成藩镇割据势力，原来的都督府制便自然退出唐代官制历史。

起初节度使制度的设立有其军事防务上的需要，但往后的发展，渐而形成中央与边防重镇之间内弱外强的局面，朝廷一旦失去控制，必将酝酿成藩镇以武力向中央造反的形势。终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爆发了“安史之乱”，历经八年给盛唐之世画上了句号，从此大唐帝国由盛转衰。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引《唐书·百官表》，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在平息“安史之乱”中，将海州隶河南节度使；乾元元年（758），改隶属卞州都防御使；二年，改隶青密节度使。这段时间正值大将军、汾阳王郭子仪率军平叛安禄山儿子安庆绪军之时。海州先后划属以上三个节度使，乃是军事上应征集粮草、兵马、民夫的紧迫需要，应该说海州地区在平息安史之乱中作出了贡献。

平息“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仍没有得到有效的改观，许多藩镇将士自主拥立将士或节度使的子弟把持帅位的继承，破坏唐政府的政令统一。如建中二年八月，平卢节度使李正已死，其子李纳竟自称“留后”统揽节度。直到唐宪宗时（806—820），唐中央终于加大力度打击藩镇势力，取得成效。特别是元和十四年（819）征讨当时最大的藩镇——占有山东全境，并跨有河南、安徽、江苏（海州在其内）部分地区的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杀

李师道收复淄青，至此唐王朝得到了暂时的统一。海州其时属“淄青平卢节度使”节制。经过宪宗时期对藩镇的几次打击，总的看唐中后期除河朔地区（即今北京市、河北定县、大名一带）等藩镇割据外，绝大部分不再割据，一定程度上也施行唐朝的政令。到黄巢起义失败（884）之后，各地节度使纷纷争夺地盘，无视朝廷权威，甚至发生了抢夺并挟持唐诏宗的丑剧，唐政府失去对大部分藩镇的控制，直至五代前。

有唐一代海州隶属的节度使分别是：

肃宗至德元年（756）隶属河南节度使

肃宗乾元元年（758）隶下州都防御使

肃宗乾元二年（759）隶青密节度使

代宗宝应元年（762）隶兖郓节度使寻改隶淄青平卢节度使

代宗大历四年（769）隶海沂密都防御使寻复隶淄青平卢节度使

德宗建中三年（782）隶徐海沂密都团练观察使

德宗兴元元年（784）复隶淄青平卢节度使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隶兖海密都团练观察使

穆宗长庆元年（821）隶沂海节度使

文宗大和八年（834）隶沂海观察使

宣宗大中五年（851）复隶沂海节度使

昭宗乾宁四年（897）隶泰宁军节度使

昭宗光化二年（899）隶淮南节度使

以上节度使统治期间，徐、海、沂、密地区经常发生节度使争夺州县治权的冲突，海州地区深受其害。如德宗二年（785）冬十月，徐州刺史李洧归顺朝廷，要求领徐、海、沂观察使之职，之前曾有约于海州刺史王涉、沂州刺史马景通，“苟得朝廷诏书，必能成功”。时海、沂二州为李纳所据，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遣兵击海州，刺史王涉“以州降”。到第二年正月，陈少游攻占海、密二州，复又被李纳“攻陷之”。虽然朝廷诏书已下，却成一纸空文，李洧“竟一无所得”（见《通鉴纪事本末》）。节度使之间在沂、海、密一带争夺土地、财赋和人口，经常发生战争，使人民遭受侵凌之苦，农业生计蒙受损失，地方经济发展无从谈起。尾大不掉的节度使让唐政府既头疼又无可奈何，只好听而任之。到元和年间，宪宗李纯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决心铲除藩镇势力，在全国基本扫平藩镇割据势力的最后阶段，集中力量打击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宪宗诏淮南节度使李夷简，令其参加平定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的战役。李夷简命楚州（今淮安）刺史李听领兵在海州一带与淄青兵展开决战。李听整顿绵弱的淮南军，使军心大振，士气高涨。战役开始，淮南军从涟水直破沭阳，后又开掘了龙苴堰，使海水倒灌威逼海州城，最后攻取了海州，接着又攻占了朐山军戍。致原来作壁上观的怀仁（今赣榆）、东海（今云台山）两县“望风送款”。这一战役截断了淄青兵南逃之路，取得了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唐代“经安史之乱”后形成方镇（道）、州、县三级制，德宗贞元十四年（798），贾耽上《十道录》时，“道”已不再设负有巡察之任的官员，已成为纯粹的地理区划概念，与行政无涉。“道”是一个大的自然地理区位，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东北、华南、西北等地区一样。唐初“道”的建置至此改为“镇”（又称“方镇”）的建置，由节度使统辖。到宪宗元和十五年（820），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时，“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海州与密州、沂州同属兖海密都团练观察使，领朐山、怀仁、东海、沭阳四县。

这里还要略谈一下唐代州郡易名问题。唐开元仍袭用初唐之州县制，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州为郡，至肃宗乾元元年（758）又改郡为州，从此不再有郡的建置。故唐立国 290 年，仅 16 年称郡。平时我们所说的海州是“东海名郡”其实存在概念上的不清。历史上的东海郡秦汉魏晋时治在今山东郯城，与今海州地境无涉。南北朝东魏、北齐时，曾在今云台山（时称郁州）短暂建过东海郡，隋所建东海郡时间也很短。所以说“东海名郡”之东海，应该是一个自然地理（即濒临东海）概念，而非行政建置之地也。

（作者单位：朐海书院）

责任编辑　邱仕明

# 再说李汝珍

## ——纪念《镜花缘》成书200年

李洪甫

1817年，在海州板浦教书的乾嘉学者许桂林在《洗炭桥》的《前引》里说："顷见松石道人作《镜花缘》初稿已成，将付剞劂。"200年来，《镜花缘》及其缔匠，那位在中华文坛上风采照人的"咄咄北平子"——李汝珍，深负赞羡；也争议纷纭。

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何满子先生主编的《十大小说家》，李汝珍入列清代四位著名稗官之一，与曹雪芹以及蒲松龄、吴敬梓齐名。

《镜花缘》的序作者洪隶元在《镜花缘》序里叹羡李汝珍能"繁征博引，包括靡遗"；晚清思想家、小说批评家王韬在他的《镜花缘》图序中称赞该书是"兼才人、学人之能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推誉《镜花缘》是一本"以小说见才学"的书；那位被学界认作在《镜》书的著作权上有些纠葛的海州人许乔林也在自己的《镜花缘》首序中承认："枕经葄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津逮渊富，足裨见闻。"

然而，这位大半生客居他乡的文坛巨子，既无厚禄，又无显达，加之身后的萧索，他的大部分行迹终难寻觅……

李汝珍，字松石，号松石道人，约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关于李汝珍的祖籍，说得更加准确的当是《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职官表》中关于李汝珍兄长李汝璜籍贯的记录："李汝璜，大兴人。"

乾隆四十七年，约19岁的李汝珍随兄长李汝璜到海州板浦(今连云港市海州区板浦镇)，次年，李汝璜就任板浦场盐课司大使。三弟李汝琮的两个儿子李兆翱、李兆翔也随行到达海州。

胡适先生在《镜花缘考证》中说，李汝珍"大概是个秀才"。翰林院侍读余集在《李氏音鉴序》中指说李汝珍"少而颖异，不屑章句帖括之学"，孙佳讯先生以此推测李汝珍"恐怕连个秀才也不是"。可是，嘉庆六年(1801)，李汝珍走进需要有生员资格的乡试考棚，当然，依旧是名落孙山。这位满腹经纶的"老子的后裔"，只好通过青衫偃蹇的读书人求取一官半职的老路，与吴承恩进入南京国子监读书、候选，吴承恩谋了个"长兴县丞"，李汝珍做了河南"治水县丞"，同为比芝麻更加细微的八品小官。

官职固然小，李汝珍当得有良心、有胆魄，尤为难得的是：很专业！据《大清历朝实录》，为了河南的水患，朝廷发出专门的"圣谕：豫省河工……宜加谨慎，不可稍忽"。熟读古今水利专著的李汝珍，果然施展了非凡的"经世之才"。许乔林有一首《送李松石县丞汝珍之官河南》：

"今兹河又决，蹈陆势浩瀚，数十万民夫，约束资将弁……吾子经世才，及时思自见，熟读河渠书，古方用宜善。"

看看他的《镜》书第35回《揭榜唐义士治河》，这位"聪明绝世"的小说家，自况唐敖大谈治水经；其中，既有李汝珍在河南的治水经验，也掺杂他的叔丈许乔林父亲许阶亭在运河通判任上的阅历。

做官的同时，李汝珍又写出了一部代表乾嘉时代音韵学水平的专著《李氏音鉴》。他的妻弟许桂林写有一部《许氏说音》，也是一位造诣甚深的音韵学家，许桂林在《李氏音鉴·后序》中回忆了与李汝珍

的往事:“松石娣夫,博学多能,纵谈音理,上下其说。”

嘉庆九年(1804),李汝珍去淮南草堰(今盐城东台市)看望在那里做盐官的兄长,李汝璜为《李氏音鉴》作序。次年,李汝珍又去河南做了一任小官。赴任时,李汝珍的心境堪称踌躇满志。可是,并没有像石文煃在《李氏音鉴·序》中所祝愿、期望的那样:“黼黻皇猷,敦谕风俗”就是辅佐朝廷,维系纲纪,劝勉黎民,导风正俗。而是像他的叔丈许阶亭在运河一样,河工尚未告竣,已经焦头烂额。

离开沉浮的宦海,李汝珍将大半生的学术感悟和经世才情,化作镜花水月中的长吁短叹,融入那宽广的腹笥胸膺。此后的年月,李汝珍主要在板浦或草堰滞留,致力于《镜》书以及其他专题著述的写作。嘉庆十五年(1810),《音鉴》在板浦定稿,初刻本面世;嘉庆二十二年(1817)秋,补写《受子谱》的《凡例》,全书付梓出版;当年冬天,约50万字的《镜花缘》脱稿。

100回《镜花缘》的前50回,写武则天夺取帝权,改国号为周,成为唯一的中华女皇;唐室旧臣徐敬业、骆宾王等起兵反对,兵败。武则天更加横行独断。于冬雪严寒之际,趁醉诏令百花齐放。百花仙子,出游在外,众花被迫开放。玉帝把百花仙子和其他九十九位花神贬降凡尘。百花仙子降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取名小山。唐敖进京应试,中了探花,因曾和徐敬业等结拜,被革去探花,降为秀才。唐敖随妻弟林之洋去海外经商,见识了奇人异事、草木灵植、虫鱼鸟兽,终隐入小蓬莱山。唐小山要林之洋带她海外寻访,得唐敖的信,约她考中才女,再行相聚……

后50回写武则天开设女考,录取一百才女。张榜后举宴庆贺,展示才情风华、百艺技巧……李汝珍就此着意地在《镜》书中数典谈经;不无调侃地声称,他的书,能使读者困倦时,驱除睡魔;就餐时,开怀喷饭。

夸张了吗?还真有人如是言。爱新觉罗·裕瑞曾在《枣窗随笔》里指责李汝珍“自夸不绝口”,妄言“千古独步”,是“不自量”。甚至捎带上写序的许乔林:“作序者妄作标谤推崇语,已属可厌。”王子春甚至批评《镜》书“卖弄稗贩,刺刺不休”——为贩卖琐细的劣贱而喋喋不休;然而,这位曾出使俄国的、著有《通商始末记》和《瀛海言》的广西巡抚,最终还是叹服《镜花缘》里的拟句是“工雅浑成,几似宋人佳制”。

十分考究立意、选材乃至择句的鲁迅,针对《镜花缘》的用典引故说了公道话,认为那是“作者匠心,剪裁运用”“以小说见才学者”;是“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与万宝全书相邻比”。如此推崇一部古代小说的才情,在鲁迅的笔墨中,堪称绝无仅有。因为,上述诸多堪称极致的评语,在《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稗官名著的各路批手笔下,都没有出现过。

《镜》书大篇幅地讲述着诱人的虚无和美丽的空幻,点睛在镜像和水月。而镜中风云的现实背景正是李汝珍长期寓居的江苏最高峰——海州云台山间。第20回《丹桂岩山鸡舞镜,碧梧岭孔雀开屏》写得激荡腾越:

“忽听……身旁飞出一鸟,其形如凤,尾长丈余,毛分五露,撺至丹桂岩,抖擞翎毛,舒翅展尾,上下飞舞,如同一片锦绣。恰好旁边有块云母石,就如一面大镜,照的那个影儿五彩相映,分外鲜明……后来因见孔雀……五颜六色,华彩夺目,金碧辉煌,未免自惭形秽,鸣了两声,朝着云母石一头撞去,竟自身亡。”

早在明万历年间海州贡士顾乾编撰的《云台山志》中,天然镜子石的记录赫然在目。这面人间最古老的镜子前,上演过惨烈的“山鸡舞镜”的悲剧。

乾隆三十七年(1772)面世的《云台山志》还收有两首关于镜子崖的诗,明白无误地讲述了山鸡对镜而舞的掌故:

“峰头有石明于镜,
照彻山鸡舞罢时。”

诸多文献,皆早于《镜花缘》的成书,就是说先有云台山里的镜子崖,后有《镜花缘》书中的“云母石”。

海州的古代方志、山志中可以看到许多“凤凰山”“凤凰崖”“丹崖石”“镜子石”等地名。尤其是《镜花缘》中的“碧梧岭”,就是现实世界里风凰山所在的海上苍梧岭。苍、碧,是相近的色彩,一字之转,可窥《镜花缘》创演之斧痕。面对着云台山,“文采何陆离”的李汝珍舒展出创演开达的文思:“西山名叫凤凰山,上面梧桐甚多,又名碧梧岭。此事不知始于

何时，相安已久。”

李汝珍借助梦幻，渲染了一个鸟的世界、鸟的王国和鸟的国度：“半空中倒象人喊马嘶，闹闹吵吵，连忙出舱仰观，只见无数大鸟，密密层层，飞向山中去了……”

众所周知，《镜》书伸张女权，写得泼辣、淋漓；《镜》书更看重女史才情，表露尽致。

常熟人、号“虞山女士”的钱守璞深为《镜花缘》的文思之奇巧、笔触之开达所折服，赞颂道：

“人间哪有小蓬莱？
慧想奇思笔底来。”

她认为《镜花缘》的立意优越于《红楼梦》，红楼中的儿女情长、痴男疯女远逊于朝廷应对场上的巾帼雄才和英姿飒爽：

“笑他未醒《红楼梦》，
只写寻常儿女痴。”

钱守璞对李汝珍的身世很熟悉，她的诗，除了充满“侬侬”的南国风韵外，也睿智地暗喻出书的作者，为一百年后《镜花缘》著作权之公案的评判埋下了重要的线索：

“端和焚香拜谪仙，
前身应亦是秋莲。
传神欲倩先生笔，
谱入空花镜里缘。”

钱守璞借“谪仙”和“秋莲”隐喻了青莲居士李太白，明白地标示出《镜花缘》为李汝珍所作。

《镜花缘》的主要版本，先后有嘉庆二十二年（1817）江宁书坊的“抢刻本”、嘉庆二十三年的苏州“原刻本”、经李汝珍修改的道光元年（1821）刻本、经李汝珍再次修改的道光八年广州芥子园新雕本、道光十二年芥子园绣像本、道光二十二年广东英德堂增图刻本以及光绪三年（1877）怀德堂藏版本等。

由李汝珍亲自监刻的原刻本刷印之际，苏州的书坊市场上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抢刻本《镜花缘》，它是江宁桃江镇（今南京江宁市陶吴镇）书坊根据《镜花缘》的传抄稿本抢先私刻的。于是，当年的李汝珍决定去江宁县衙门“禀办”。

这桩中国出版史上最早的版权诉讼，在当事人李汝珍的侄儿李兆翱写给许桂林的信中有明确的表述，此信又被许桂林的堂侄裔孙许绍蘧先生所保存，以致我们今天能够知道事情的原委和始终。

江宁桃红镇刻本，人们称之为“私刻本”或“传抄二稿抢刻本”，相当于今天出版界深恶痛绝的盗版本。此本未经李汝珍进一步的修订，但已有蔬庵的评批，蔬庵是《镜花缘》评批者中书写内容最多的一家批手。该本至今未见保存下来的完本。就是说，当年的“盗版本”如今也成了版本学者、尤其是《镜花缘》研究者到处寻觅的“善本”。江苏灌云县人孙佳讯先生在南京图书馆收藏的一种刻于清道光八年之后的清坊本中，发现装订时误入的江宁桃江镇刻本八十七回的两页。正是《镜花缘》大谈酒令的生花得意之处，也有不少“惊人之笔”。书眉上正印有蔬庵的评语：

“先生写百名才女”“必效”“施耐庵著《水浒传》”“细细白描”。

由于抢刻本的影响，苏州原刻本一度滞销。好在“盗版本”受到李汝珍的告官和追究，印数也有限。不久，苏州原刻告罄。三年后的道光元年，《镜》书于苏州再版。

由于苏州原刻本后期的销路甚畅，道光元年，经过作者修订的本子，依然出现多家抢刻。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道光元年刻本至少有三种以上的版式。这些抢刻的书商（至少三家），是否经得李汝珍的首肯，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李汝珍对这些抢刻本似乎只能保持沉默。嘉庆二十三年，发现江宁抢刻本时的那种义愤填膺、赶赴江宁打官司的气概，已经销匿殆尽。

嘉庆二十三年（1818），李汝珍从“淮南草堰场”出发去苏州亲自监刻已“敷衍了卷”“收拾誊清”的《镜花缘》，这就是著名的“定稿本原刻”。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人民文学出版社选择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标有“马廉隅卿旧藏”字样的道光元年本，经张友鹤先生校注，于1955年4月出版，成为当今最为流行的《镜花缘》铅印本，至今已印142.65万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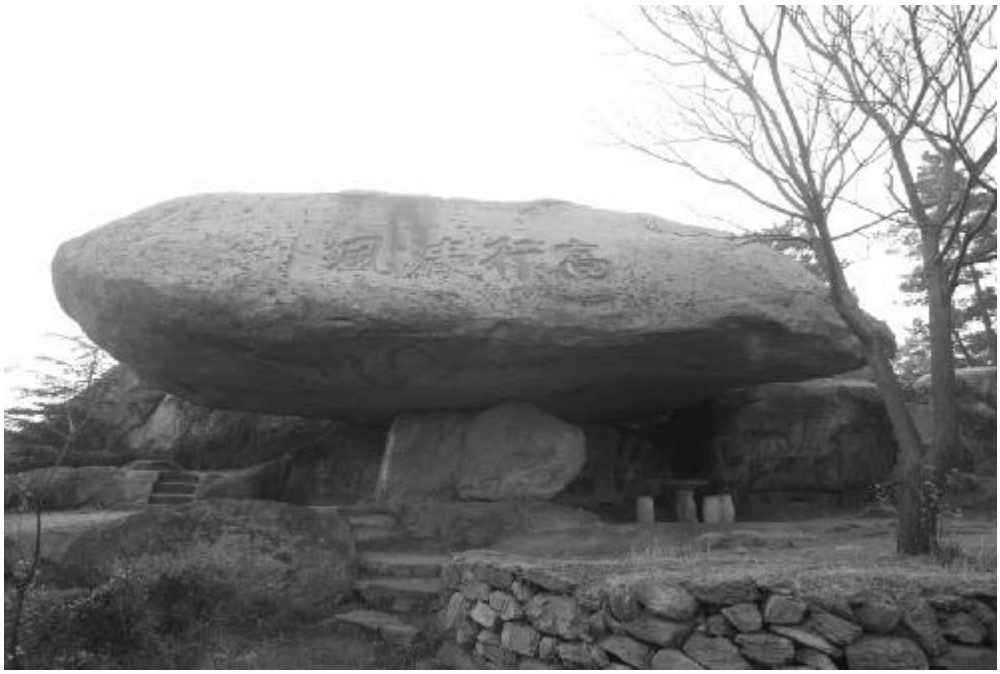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 林廷玉诗吟海州八景

张树庄

林廷玉，字粹夫，福建侯官人。生于明朝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卒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年）。《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二》有林廷玉传：“福建侯官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以工科都给事中（都给事中，官职名称）因劾副主考程敏政场屋阅卷可疑六事，令敏政致仕（辞官退休），廷玉谪（降职到偏远地区）判（判，判官，官职名称）海州。刚明果断，民服其公，修理学校及祠庙坛，蜚政声丕著。后果累官至都御史。”林廷玉在海州做了不少好事，也留下了不少文字和石刻，其中孔望山龙洞前就有林廷玉的石刻。但人们传诵得最多的还是林廷玉的《朐阳八景》诗。朐阳就是指锦屏山一带，当时是海州的政治、文化中心。



海州八景之石室春风

《隆庆海州志·卷之十·词翰》载有林廷玉的《朐阳八景》诗：

崖阴积雪粉妆峰，石室春风霭气浓。
马耳晴岚飞彩凤，虎峰夕照应非熊。
旸谷朝霞金罩柳，疏楼夜月玉笼松。
苍梧晚渡人归后，蒙羽秋成乐岁丰。

八景，我国古代约定俗成的一种风物景观，也是人文文化的一种历史体现，名胜地多称其景物为八景。作为代表性的八处景物常常是某一名胜地、

或者扩大到某一城市或地区的著名景物的集合，并多为它们的历史和人文的重要反映和象征，历代文人墨客也多集中予以题咏描绘。八景的选择和命名也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至今仍有不少城市进行过八景的评议和更新。这首八景诗很有名，在我市流传很广，直至今天，仍被广泛引用。它用极其简练而又精准的语言高度概括了海州的八处景点，突出每一处景点的特色，语言简练生动，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然而，不少人读了这首诗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诗题是朐阳八景，应该只写锦屏山周围的景色，然而，这八景中，只有前四景是写海州的，另一半则写今东部的平山、东磊，还有云台山、东海县甚至山东蒙山等处的景色，似乎与海州不太搭边。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我们来细细品读这八句诗：

“崖阴积雪”指冬季的锦屏山，山背面的积雪长时间不化，山头如同是用白粉装饰起来的。“石室春风”指石棚山石曼卿读书处的石棚，春光明媚，云霭萦绕。“马耳晴岚”指锦屏山的马耳峰在阳光照耀下，岚气蒸腾，犹如彩凤飞翔。“虎峰夕照”指白虎山在夕阳的映照下，犹如一头沉睡中的白虎。这四景都与“朐阳”紧扣，没有什么争议。

“旸谷朝霞”指朝阳升起在山谷中，朝霞满天，初春的柳丝像被罩上一层耀眼的金色。旸谷：日所出处。《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传》：“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我市多数读者都认为这里的“旸谷”是指东磊。因为清代乾嘉学派的王良士指称东磊就是当年羲仲、羲和举行祭日大典的圣地。作为经学家的王良士乘船泛海在中国东部沿海搜寻了几十处海岛，得出的结论就是“仆泛海自碣石登莱，穷沙门数十岛，登成山之罘，憩息琅玡，遵海而南，求所谓嵎夷旸谷者不可得。《史纪》中《始皇纪》谓立石朐界为秦东门，云朐界者，今海州镇山古朐县也。秦统天下，以朐山为东门，则有虞氏幅员最广，亦宜以此山为有虞东界。云台在海中，周二百里。为岛屿无疑，东磊面东为谷，四时旭日所照，奇峰怪壑，异草仙花，必羲和所居之旸谷也。”这一说法得到大部分人的赞同，但也有异议。如今，有的学者认为羲仲祭日的旸谷应该是锦屏山南麓的将军崖岩画处，也不无道理。实际上只要从山谷中看到太阳升起，都可谓“旸谷”。这里的“旸谷朝霞”就是指太阳从锦屏山的山谷中升起，霞光满天的景象，而非东磊。也就是说，在明代，人们还确认旸谷在“朐阳”，因此该处景点非海州莫属了。

“疏楼夜月”写海州的景疏楼笼罩在皎洁如玉的月光下，连周围的松树都好像是“碧玉妆成”。“景疏”二字是景仰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二人的意思。疏广，字仲翁，仕至太子太傅；兄子受，官至太子少傅。在位五年，认为“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于是，上疏请退，上许之，赐黄金百斤，太子赠五十金。公卿大夫设供帐，祖道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二疏归乡后，散金与诸故旧，召乡老欢饮，不治田宅。有人劝说二疏留些金银给子孙，广曰：“贤者多财，则损其知（智慧、思想）；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会犯更多的错误）。”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影响巨大，成为教育子女，重义轻财的好教材。人们纪念二疏也是情理中的事。这景疏楼在什么地方？争议最大。《隆庆海州志》说二疏墓：“在东海平山。”《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述，宋石曼卿通判海州时，“以州东北二古墓为二疏墓，刻碑其旁，后遂收入图经，建有景疏楼”。楼旁石刻有云：“宋叶祖洽慕汉二疏之贤，遂建此楼。”以后的州志多从此说。直到金兵占领海州时还存在，所以诗人党怀英路过这里，写出了“景疏楼下无边水，暂濯尘缨可自由”的名句。宋代大文豪苏轼亲自游览过景疏楼。在景疏楼上与朋友开怀畅饮，怀念挚友，吟诗寄唱。这件事发生在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离开杭州通判的职务去密州（今山东诸城）赴任，曾于是年八月在今镇江甘露寺的多景楼上与好朋友、原海州知州孙巨源相遇。两人在多景楼上畅谈吟诗，把酒畅叙的过程中，孙巨源把将离开海州时，与朋友坐别于景疏楼的事告诉了苏轼，苏轼在《次韵孙巨源》的诗中自注“巨源近离东海郡，有景疏楼”。后来两人同行至楚州（今淮安）时才分手。十一月十五日苏轼来到海州，念念不忘

朋友孙巨源介绍的景疏楼，与当时的海州太守会于景疏楼上，作《永遇乐》词以表达对孙巨源的深刻怀念。苏轼在《寄孙巨源永遇乐诗序》中写道："孙巨源以八月十五日离海州，坐别于景疏楼上；继而与余会于润州，至楚州乃别。以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与太守会于景疏楼上，作此词以寄巨源。"词曰：

长忆别时，景疏楼上，明月如水。美酒清歌，留连不住，月随人千里。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卷珠帘，凄然顾影，共伊到明无寐。

今朝有客，来从濉上，能道使君深意。凭仗清淮，分明到海，中有相思。而今何在？西垣清禁，夜永露华侵被。此时看，回廊晓月，也应暗记。

另外，苏轼提及景疏楼的诗还有一首是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的《送赵寺丞寄陈海州》的诗作：

景疏楼上唤峨眉，君到应先诵此诗。

若见孟公投辖饮，莫忘冲雪送君时。

这景疏楼由于苏东坡的光临而名噪一时，但到底在什么地方，人们多有猜测。首先，我们看苏东坡并没有到过时属东海县的平山，苏东坡曾有诗句云："欲济东海县，恨无石桥梁。"因此可以明确地说明景疏楼不在平山，而在海州。《海州文献录》则用较大篇幅，写时任海州沭阳县主簿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在所著《梦溪笔谈》中关于二疏墓的考证。沈括认为平山的二疏墓实际上叫做"黄儿墓"，至今尚在，连黄儿墓周围的村庄都叫黄墓庄。说二疏墓在平山就是因这里有一座古墓名黄儿墓，而误把二疏墓说成是在平山。到这里，人们就非常明确了，说景疏楼在平山是错误的。有的人考证认为景疏楼就在原海州府的院内，即原海州师范那儿。另外，多数写景疏楼的诗也都指定海州。

"苍梧晚渡"写苍梧山（今云台山）到朐山头之间的渡口，傍晚无人，船家归去的景象。这处渡口，在古代很有名。金代海州诗人贾伯良有一首《苍梧晚渡》的诗，写这里"瀛海洋洋岛溆青，沙头候渡月将生。操舟三老醉逾健，放棹中流恬不惊"。清乾嘉时期海州著名诗人吴振勃也有《苍梧晚渡》诗："一水限南北，苍梧近莫攀。还因乘宝筏，始得到仙山。欸乃沧波里，仰须夕照间。旧闻传父老，想象指溪湾。"

最后一景"蒙羽秋成"写海州西郊秋天丰收的田园景象。蒙羽指山东的蒙山、东海的羽山。上古文献《禹贡》，"淮沂其乂，蒙羽其艺。"意思是说，淮沂二水得到治理，蒙山和羽山地区就能种植庄稼了。

很多人认为"苍梧晚渡"这处渡口离海州还很远，蒙山和羽山更不在海州城内，作为海州八景似乎有些牵强。其实，这两处景观是站在锦屏山上远望看到的景色。曾经有一副对联，将海州八景中的四景连缀起来，清楚地表明了它们的位置关系：马耳晴岚东望苍梧晚渡；虎峰夕照西眺蒙羽秋成。

海州八景诗的特点很鲜明，诗中将时空的距离拉得很大，但又能巧妙地连缀在一起。既有春夏秋冬季节的变换，又有高低远近位置的移动。作者由高及低，由近及远，依次叙述海州八景，让读者随着诗人的思路游弋于海州美丽的景色之中。诗中先写高处的崖阴积雪、虎峰夕照、马耳晴岚、石室春风，接着写低处的旸谷朝霞、疏楼夜月、苍梧晚渡、蒙羽秋成。先写近处的景物，亲临马耳绝顶；再写远处的名胜，极目远望，可以看到苍梧晚渡的荒凉，蒙羽秋成的喜悦。这八景全是朐阳景物，如今有些景物虽然不在，但它却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明代时海州的实际情况，十分珍贵。

（作者单位：连云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 徐福与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

葛永明　杨桂珍

丝绸之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的丝绸之路另含海上丝绸之路。而海上丝绸之路又有西方航线、南方航线和东方航线之分。本文试就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徐福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的开拓者、赣榆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的最佳起航点、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是中日韩三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纽带等方面作以论述，谬误和不到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 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

陆上丝绸之路是起始于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最初的作用是运输古代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的商道，后来成为东方与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

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以中国西汉的首都长安为起点，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到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这条遥遥近万里最初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被认为是连结亚欧大陆、传播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据考，先秦时期这条连接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就已经存在，但当时交流的商品是玉石，可以说延续万年的玉石之路就是后来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前身。

史载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正式开通了陆上丝绸之路。1877 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 114 年至公元 127 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社会所接受认可并正式运用。因此，自西汉张骞通西域至今，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已造福人类两千余年矣。

海上丝绸之路同样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最初有文字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应是起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繁荣于唐宋，鼎盛于元明，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与陆上丝绸之路有“西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也可综合分为三大航线：即由中国沿海港口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东方航线；至南亚诸国的南方航线；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的西方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方航线和西方航线专家学者论述颇多，本文不再详述。东方航线的提出因与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兴起的徐福研究热有关，作为徐福故里徐福研究者，很想提出一些观点，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据史料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从中国南方港口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与此同时，从中国北方港口出发向东航行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或称东方）航线，虽没有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轰轰烈烈，但

仍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形成的年代要早于南方航线和西方航线，同陆上丝绸之路早期的玉石之路样，产生在上古时代。它是一条从山东半岛经渤海、黄海通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古老的海上航线。在航海技术十分落后的远古时代，有一条发源于日本海的自然回旋的海流促成了这条古老的海上航线。

赣榆古属齐，秦汉时隶琅玡郡，毗邻山东半岛，赣榆沿海之海州湾与渤海湾同潮同流，赣榆与山东日照、临沂阡陌相连，山川相依。古代中国北方黄海流域的产丝区主要在山东半岛，史载“山东多丝”，有“齐鲁冠带衣履天下”之说。秦汉时期为皇帝和皇亲贵戚制作四季服装的三服官均设在山东。山东地区的蚕桑丝织业如此发达，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仅有一水之隔，又有一条起自日本海的左旋回流自然形成的海上航道连结东西海岸。因此，我国古代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等先进技术和文化，最先经海路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是完全可行的。

### 徐福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的开拓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全国地名普查工作中，发现江苏省赣榆县金山镇徐福村是秦代方士徐福的故里，徐福是有文字记载的东渡扶桑的第一人，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的开拓者。这一重要发现在《光明日报》上一经刊出，立即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轰动，因而掀起了新一轮徐福研究热。经过国内外学者专家三十多年的研究和考证，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徐福确有其人，东渡确有其事，徐福故里在赣榆县金山镇徐福村，徐福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的开拓者。徐福，字君房，齐地琅玡（今江苏赣榆）人，秦时著名方士。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指挥能力，且造福百姓，乐于助人，在故里民众中名望颇高，深受乡亲爱戴。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第一次东巡，登泰山封禅祭天，勒石颂德，然后经黄县，攀成山，登芝罘（今烟台），南下琅玡台，一度逗留赣榆、朐县一带。在此期间，秦始皇在海州湾内秦山岛上看到海中出现海市蜃楼，认为是仙人所显，遂派徐福率童男童女乘楼船入海，寻求长生不老仙药。

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率童男童女和百工巧匠，携五谷蚕桑在中国沿海各口岸多处寻求东渡最佳航线，历时十余年，经十余地，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均未成功。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东巡再次来到赣榆，召见徐福，询问东渡没有成功的原因，徐福禀告海中有大鲛鱼十分厉害，船只难以靠近仙山取药，须派善射者同去，射杀鲛鱼，才能上岸求药。秦始皇听后非但没有怪罪徐福，反而再次派徐福携带童男女以及百工巧匠，装载五谷种子、粮食淡水，一应生产生活用具，并根据徐福的请求，增派五百武士射手，武装护航。这次徐福东渡，虽然仍没有获得“不老药”，但在日本列岛熊野浦登陆后，发现了“平原广泽”（即日本九州），便长居于此，“止王不来”了。过去有史家说是徐福恐怕秦始皇怪罪，编造谎言欺骗了秦始皇，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心切，才再次派徐福东渡的。试想雄才大略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岂能被徐福花言巧语所骗。徐福历十余年的时间，在中国沿海寻航不下十余处（今遗址遗迹遍布东南沿海），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在被史家称为暴秦的始皇面前能继续获得信任，再次得到最高统帅的鼎力相助，终获东渡成功，绝不是“诈言”“谎骗”所能得逞，必是君臣之间早有默契共识，那就是渡过苍茫大海，一探对岸崭新天地。至于徐福后来“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可能是徐福在日本列岛驻扎下来以后，探得秦始皇已死，国内大乱。赏识自己，支持自己工作的主要领导已不在人世，真要回去的话，撞在小人的手里，岂不是白白送死，何况这时徐福在日本已经扎下了根，做出了一番事业。

徐福奉秦始皇之命，以东渡海上三神山求仙药为名，历尽艰辛，拼搏十年，终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东渡大业，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或许说徐福并不是开创海上丝绸之路的始作俑者，在此之前，古代先民们都曾做过积极的努力和探索，但毋庸置疑，徐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东渡使者；或许说海上丝绸之路还有南方航线、西方航线，但徐福开辟的东方航线的大陆起航点、“止王不来”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上的遗址、遗迹尚存，有史可询，有据可查；或许说

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的开创者并非徐福一人之功，是古代先哲们勇敢与智慧的集体结晶，但通过历代专家、学者的研究可证，徐福是开创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的领率人物和佼佼者，正因为如此，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佛教协会原主席赵朴初先生曾赋诗咏道："海上丝绸路早开，阙文史实证摩崖。可能孔望山头象，及见流沙白马来"，并盛赞徐福："徐福盖智士，托迹王子乔。勇率三千人，奋身犯波涛。扶桑讵云远，蓬莱不足高。避地胜桃源，揖别秦王朝。二千二百年，不尽往来朝。西岸柳枝舞，东岸樱花招。徐福其仙乎？名留百代标。一呼两岸应，并肩致勤劳。共建花萼楼，共造万里桥。世世乐怡怡，高谊凌青霄。"

### 赣榆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的最佳起航点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向东方、向海外发展，开辟了自长安——洛阳——徐州——海州湾的驰道。沿着这条驰道，秦始皇曾东巡到赣榆，并"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今人考证秦始皇立石东海上的秦门东，一在赣榆以东海州湾内的秦山岛上，一在海州湾内的古朐县，总之都在今连云港地域。赣榆境内至今仍保留许多与秦始皇有关的地名，例秦始皇驻跸的"下驾沟"，饲养马匹的"饮马池"，被群众称为"马趟子"的通行车马的大道即秦驰道遗址和因秦始皇多次登临而得名的秦山岛。同时，赣榆境内还保留着许多有关徐福东渡的遗迹、遗址。例如：徐福故居遗址、徐福种药地遗址、徐福造船作坊遗址、徐福造船"圬工"住地遗址，徐福东渡起航处遗址，以及纪念徐福的徐福祠、徐福庙、兴会寺等。

徐福东渡，起航点很多，各地研究者均有理有据，言之凿凿。客观地说，徐福历十余年的时间，在沿海各地探索海上东渡的最佳航线，在各地留下了大量的遗址遗迹和传说，都值得考证研究，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妨各说并存，兼容并蓄。但不管怎么说，能够成为徐福庞大船队起航点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必须具备港深水阔、交通便捷、经济富庶、造船工艺先进等要求，在气象、海流等自然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才能跨海东渡。在赣榆，有一处入海口应是徐福东渡起航点的不二之选。

在赣榆古游水入海口之北岸，古荻水河入海口之西岸，有座建于春秋时期的纪鄣城，杜预注《左传》纪鄣条载："纪鄣，莒邑也，琅玡郡赣榆东北有纪鄣城"。纪鄣城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东南临海，南面紧靠游水入海口，东面紧靠荻水入海口，位于两条河流入海口交汇处。纪鄣城北隔荻水河与岚山港为邻，以岚山群峰为屏障，使纪鄣城成为一处天然避风良港，且海运、河运均十分便利。近年在古纪鄣城附近的大、小王坊村出土了大量的碳化木。经碳14鉴定，距今已有2000～3000年的历史，专家考证是当年徐福造船时遗留，大小王坊村是徐福造船处遗址。《江苏航运史》等史籍都认为：关于徐福东渡出海口，当以徐福村东10余里之古纪鄣城最为恰当。试想当年徐福生于斯、长于斯，对纪鄣城一带海域、水文、气象等情况了如指掌，在此集中大量木材，兴工建造渡海所需艨艟楼船，应是最佳选择。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徐福东渡的船队就是在这里集结的（最起码有一次以上）。从纪鄣城古荻水口出海后，沿海州湾北上，至琅玡湾中斋堂岛、沐浴岛，令童男童女百工武士沐浴更衣，再北上经胶州湾之徐山，过徐福岛（今山东崂山县东）入大海东去。终于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抵达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成为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东渡第一人。

### 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是中日韩三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纽带

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外交往的国际路线，之所以称为"丝绸之路"，是因为古罗马人非常喜爱中国的丝绸，对中国也很向往，他们称中国为"丝国"，视中国丝绸为珍宝。张骞通西域带去了大量的丝绸，丝绸成为中国连结世界的纽带，故此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将中国在西汉时期与中亚、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并很快被接受和认同，可见"丝绸之路"这一名词早已深入人心，世所共知。徐福东渡扶桑、开拓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向日本人民传授种桑、养蚕、缫丝、纺织、农耕、医药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造福于日本人民。日本人民对徐福奉若神明，世代尊崇礼敬。实际上，张骞开创陆上丝绸之路也好，徐福开

创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也罢，其目的和意义，不仅仅是通商贸易，也不仅仅是“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而是传播文明，促进和平，让中国走上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张骞西行和徐福东渡，都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史书均无战争的记载。虽然中途难免有分歧，有误解，甚至有格斗搏杀，但均未引发战争。张骞开创陆上丝绸之路，是以通商贸易为名，虽然真正的政治目的并非如此，但轻车简从，仅率百余从人，携大量丝绸货物，一路西行向各国或赠送，或易货，或买卖，体现的都是公平贸易，互惠互利。中国儒家历来讲求中庸之道，提倡和为贵，做生意特别讲究和气生财。张骞一路西行，吃尽千辛万苦，甚至被匈奴囚禁十余年，仍然忍辱负重，冒着生命危险，继续西行，终于完成通西域的千秋大业，成为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开创陆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人。无独有偶，徐福开创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所率之众，也不过是童男童女百工巧匠而已，虽无通商之由，但以寻仙山求仙药为名，同样历尽千辛万苦，蹈海搏浪十余载，最终以和平的方式融入日本土著民族，把中国先秦时期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技术植根于日本列岛，造福日本人民，同样成为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泛海东渡开创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人。两千多年来，日本人民尊徐福为蚕桑、纺织、农耕、医药之神，大量兴建长寿馆、资料馆、文库、公园，建碑塑像以示对徐福的敬仰和纪念。尤其是徐福故里为江苏省赣榆区金山镇徐福村这一发现被专家考证认定后，日本友人和专家学者沿着当年徐福东渡开创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纷沓而至，或寻根问祖，或学术交流，由此旨在增进友谊，体现和平的徐福文化学术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就连日本国前首相羽田孜先生都曾多次亲到赣榆金山镇寻根访祖，为徐福故里撰写了“中日友好始祖徐福”的题词，参加了“中国·赣榆第七届徐福节”，并发表演讲说：“徐福先生很早以前冒着生命危险东渡日本，为日本人民带去了福祉。我们身上都有徐福的遗传因子。现在，我们应将这些遗传因子，作为联系的桥梁，努力把中日友好事业做得更好。”羽田孜先生在参加了“中国·赣榆第七届徐福节”后，在北京又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高端访谈》栏目的专访，羽田孜先生说：“我认为，针对徐福的故事，中日韩这三个国家共有的话题，应该比以往更加珍重这个历史性遗产。让我们发挥相互学习、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的这种徐福精神，努力构筑东亚地区内相互和谐的友好关系吧！”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间徐福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韩国的徐福研究又高潮迭起。诸多专家认为徐福东渡首先到达的地方是韩国全罗南道的济州岛。济州岛居南海岛南方的海中，是朝鲜海峡、济州海峡和对马海峡三个海上通道的重要接点。有专家著文称：“济州岛是徐福东渡的第一站”，“这个孤悬于朝鲜海峡中的大岛，不仅是海上的交通桥梁，而且是重要的补给基地，成为徐福入海东渡采药的必经之路。”徐福在韩国济州道的济州岛、庆尚南道的南海岛和韩国济州岛西归浦都曾留下传说和石刻等遗迹遗址。韩国的济州、西归浦、巨济等地都有研究徐福的社团组织，活跃着一支支宣传徐福文化的队伍，并建有颇具规模的徐福公园、徐福展示馆，塑有徐福雕像和各种纪念碑。徐福故里连云港市人民政府、赣榆区人民政府都曾向韩国赠送过徐福雕像和纪念碑。国家领导人温家宝、李长春等人访问韩国时，曾参观过徐福公园里连云港市人民政府赠送的徐福纪念雕像，温家宝总理还为徐福公园题写了园名。

徐福东渡，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架起了世界和平、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创了中、日、韩友好合作的先例，促进了贸易，发展了经济，由徐福东渡衍生而来的友爱、和平、交流、促进、发展、繁荣的徐福精神，同时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徐福故里的人民，为有这样伟大的先贤而感到骄傲，在纪念徐福东渡开创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的时刻，更应弘扬徐福精神，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加强与日、韩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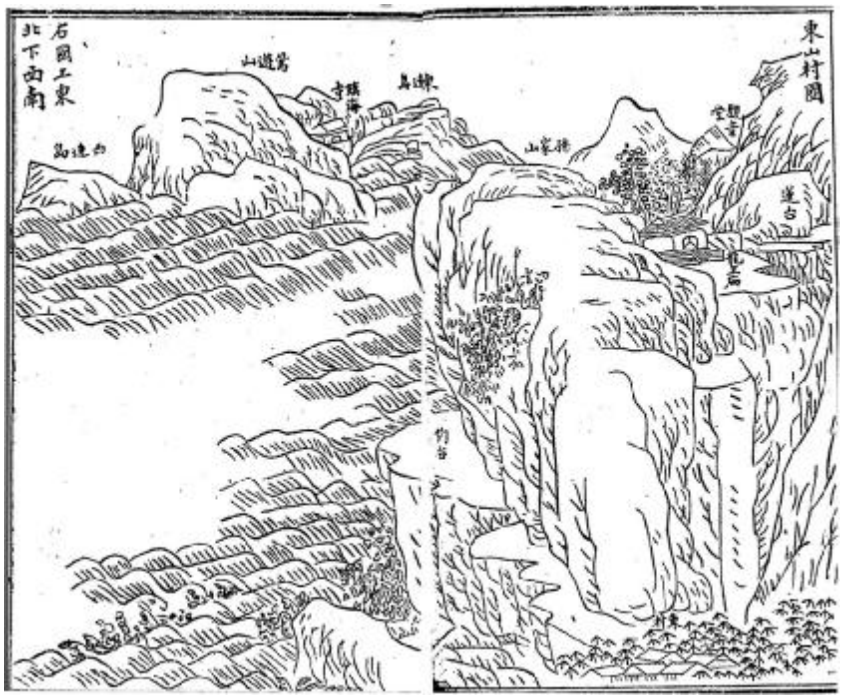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赣榆区党史区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 东山旧事从头说

## ——寻古云台十八村之二十

伏广喜　闫祥富



清《云台山志》东山村图

一日无意中从网上看到一篇介绍古云台十八村方位的文章，其中的东山村介绍曰:“目前墟沟有此村，但古代指的应当是南云台的东山村。”该文介绍的这个东山村古今方位均有误。首先，今日的墟沟地区没有东山村。其次，古代前云台山也无东山村，只有山东村。这也难怪，道光后的 100 多年间，“云台十八村”的 20 个村其中有 9 个村已更换了村名。此外，不少村建国后都已进入城镇区划，与原村框架相去甚远。最早与原村名和村建置告别的就是本文将介绍的东山村。

那一天我们在连云地区作现场调查，不光是当地百姓不知道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上有一个叫东山的村子，就连作为原东山村管辖单位的今连云办事处的多数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历史上这个东山村在什么地方。从相关史料上可以看到，这个东山村存在于市区最东面今天的东山街道境内。

东山村名最后出现时间是民国元年(1912)，其时归灌云县苍梧乡。民国 35 年(1946)，连云市正式成立，下辖的东港区也同时挂牌，下设洞山、云台、胜利、临海四镇(其时的镇实质即今之居委会)。1952 年，连云市改连云区，辖洞山、云台、临海、胜利四镇。1958 年，在洞山、云台、临海、胜利基础上建连云镇，洞山、云

台、临海、胜利由镇改居委会。此体制一直维持到 2003 撤镇建街。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2003 年以前的现连云街道，下属的洞山(今名荷花)、云台、临海、胜利 4 个社区居委会框架始终没有大的变动。那昔日的东山村在哪？在洞山社区，即今日的荷花社区。这个过去的小村庄，尽管名称几经变更，区划由村到区、到镇、再到社区，但孙家山这一名称依然保存着。

昔日的东山村辖地面积与今荷花社区大体相同，东到马腰山，南到桅尖山，西到梅岭，北到海。民国时期出版的《云台导游诗钞》上刊载的东山村人口只有四五十户，“均以取鱼为生。”这个“取鱼”即今天的捕鱼。捕鱼分海洋捕捞和淡水捕捞，紧贴黄海的东山村过去则为真正的海洋捕捞专业村，与本寻古系列之十七西石村同属云台山著名的海洋渔村。百川先生的《东山村》一诗，精彩的描绘了当年这里的风土人情：“海上乘槎欲问源，幽栖近水自成村。树荫啼鸟晴逾噪，草色穿帘春更繁。微雨渔家还柳巷，夕阳帆影落柴门。此间地僻新开径，落潮频惊野渡喧。”

国内目前以垂钓为特色并以其为景区名称的景区有 10 个，具体为姜太公钓鱼台、庄子钓鱼台、秦皇岛钓鱼台、韩信钓鱼台、孙权钓鱼台、李白钓鱼台、瘦西湖钓鱼台、北京钓鱼台。在古云台山，也有一个以钓鱼为特色的风光名胜，它的位置就在过去的东山村。具体为今连云港庙岭港区前身萧望之钓鱼处，其为明《云台三十六景》中的第三十一景，名《钓台夜月》。

萧望之何许人也？为汉东海郡兰陵(今山东兰陵县兰陵镇)人，字长倩，后徙杜陵(今陕西安东南)。历任大鸿胪、太傅等重职。宣帝病笃，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甘露三年(公元前 51 年)，在长安未央宫殿北石渠阁皇家书院召集诸儒讲《五经》的同异，并加以评议。元帝即位，以前将军光禄勋，领尚书事，辅佐朝政，甚受尊重。在这段时间里，他向皇上举荐少年时曾在古海州巨平村发愤读书，后留下“凿壁偷光”故事的青年匡衡。这位匡衡不负萧望之所望，从郎中一直升到太子太傅乃至丞相，成为古海州历代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耿直、忠贞、苦干的萧望之却遭宦官弘恭、石显等诬陷，先下狱，后被放逐到东海一隅之今日连云港，整日除读书外，即持竿长钓，用以排解胸中的苦闷，最终自杀于此。后人为了纪念他，将他经常钓鱼的地方呼之曰萧望之钓鱼处。即使在他逝世多少个朝代以后，一些朝廷大员经常与古海州的地方官一起经常到这里追思他，并留下自己的名字。如镌于此处的两帧石刻就记录两次朝廷和地方官员来此凭吊的行踪。一是海州刺史王谟，看此处危岩壁立，怪石星罗，波浪连天，而钓台则不畏风浪挺拔屹立于这海天一角，顿生感慨，留诗一首：“因巡来至此，瞩海看波流。自兹一度往，何日更回眸。”二是宋代淇水县令宋蠙为纪念他这次有意义的行程而刻下的一段文字：“县令、淇水宋蠙伯升父、苍捂房真子正，彭铸寿元，陈汝霖济卿，僧普照、德诚、行深同游。介侍父县令偕行。大定甲午夏四月十有五日。”此二刻均为重要文物，然均毁于 1978 年新港区建设时。所幸的是，市博物馆已于 1973 年冬将两刻制成拓片，藏于馆中。

东山村又名孙家山。这孙家山之名又缘何而来？据明《云台山志》载：“元孙通，字世亨，居东海，性至孝，遭母丧，贫不能葬，号泣感天。忽夜闻钱声达旦，视之，钱户壅户外。通取以葬母，余悉归官。官谓通曰：‘此汝诚孝所感。’因奏闻，旌表其门。”由此可见，孙家山之名源于一个感人的孝子故事。孝为百事先，古海州的旧志书非常推崇这一故事，故其时各个版本的志书都予转载，以起到传播孝悌、教化万民的作用。

孙家山不仅是东山村的别称，更是这一带桅尖山的别称。值得称道的是，北云台山三大主峰均环列东山村中。这三大主峰即大桅尖、二桅尖、三桅尖。桅尖即大船之帆。三个桅尖山远看还真像乘风破浪的三片巨帆伫立于万顷碧波之上。这三条桅尖，大桅尖最高，海拔 605.4 米，仅次于玉女峰，是连云港群山的第二高峰。

二桅尖在大桅尖正北，海拔 503 米。三桅尖在大桅尖偏西，海拔 435.4 米。三座山头相距不远，呈三角形排列。清人唐昆基在他的《桅尖山》一诗中描绘道："仙人船入古云台，百尺桅杆海上来。云起峰腰惊舵转，霞飞石角伢帆开。"除桅尖山外，东山村域内还环列着庙岭、梅岭、马腰山、东山岭等山头。它们就像一幅巨画，横悬于黄海南岸。

梅岭，为东山村最西面的那道山岭，今人多指此为孙家山，旧时也是一处不错的风景。明顾乾的《云台山志》称此岭"在东山村，支龙发源于沃壤，东抱上阜，北绕沧溟，冬时野梅遍岭"。整条岭都是自然生长的梅花，那该是一幅多么壮丽的画面啊。此与本寻古系列之十四诸朝村的黄泥岭梅岭堪称古海州两处最大的赏梅基地。清乾隆《云台山志》在记录这一风景时称 "亦海山佳丽地也"。此山岭海拔 357 米，面积 450 亩，南北走向。

梅岭东北山坡处原建有一座观音堂，此为乾隆时鹰游山僧普受修的下院，嘉庆时法起寺和尚德天对其进行重修，名祇园寺。祇园，是古海州庙宇中唯一称此名者，这也是祇园寺的独到之处。祇园，即祇树给孤独园略称，为释迦牟尼去舍卫国说法时与僧徒留居之处。清方士刘纯一的一篇《祇园寺记》记录了清时祇园寺的盛况："水绕山环，林木阴翳，指海上之轻舟，听林间之异鸟。"并称它与竹墩、烟岚共称"东瀛胜境"。道光辛丑（1841）江夏的童濂以海防至此，植数株苍松于院内。1920 年，祇园寺毁于一场大火。祇园寺一侧，有一处自然山石，叠石簇累，状若千层莲花，清《云台山图》和民国《云台导游诗钞》都记录了这一奇特的山石，称莲台。今人则称莲花台，今荷花居委会名就缘于此石。今人有诗形象地描绘昔日莲台的风采："荷花街上紫阳开，瑞石飞天渡海来。可叹春山新雨后，不知几人识莲台。"

祇园寺所在的那座山头，因祇园寺所在被人们俗称庙岭。此山是一座不大的小山，为梅岭向北伸入大海中的一座小山包，海拔 88.5 米，面积 320 亩，平均坡度 30 度。这座看似平常的小山，却与东方大港连云港有着不解之缘。它的东面是 1933 年开港时和 1973 年大建港口时期建设的老港区；西面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开发的新港区。最令人难忘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为适应连云港建设需要，从该山山体穿过的云台山铁路隧道工程。当时，对于是否开筑这一隧道，各方意见并不统一。一部分主张不开隧道，而是绕过庙岭山顺海铺路，以公路运输为主。而陇海局工务段认为，没有铁路作后盾，连云新港规模不会出现大的飞跃。而铺筑铁路，必须开凿庙岭隧道。开筑方案定下后，陇海铁路局于民国 21 年夏，买下原祇园寺地基，拆除尚未全毁的两殿，木料砖瓦供墟沟小学建校舍。8 月 5 日，隧道工程动工，次年 7 月 1 月竣工。11 月，满载货物的列车开始在这里穿行。此隧道全长 278 米，高 6 米，宽 5.5 米，为陇海铁路东线唯一隧道。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为其命名为"云台山洞"。在当时开山技术非常落后的情况下，"穿山真如劈龙门"，很多工人在这里献出了年轻生命。当时，从新浦至老窑段铁路共设 5 个站，此处站名为孙家山站。另外四站分别分盐坨(今猴嘴)、新村(今朝阳马山后)、墟沟、老窑(连云港最早港区)。2009 年 6 月，东陇海铁路中云至连云港段实施电汽化改造土程，孙家山铁路隧道被列入被拆除范围。至此，位于旧东山村内的这一铁路隧道，完成了它 77 年的历史使命。为保存这段部分历史记忆，当时的连云区文体旅局及时采取妥善措施，将嵌筑在隧道东端的"云台山洞"门楣石刻以及部分石质构件采取了异地保护措施。

从 1976 至 1981 年，庙岭地区迎来连云港新一轮建设高潮。在这 4 年时间里，山头被劈去一半以上面积，取石料 7000 多方，填起陆域面积 90 万平方米。到 1982 年，新建年吞吐量集装箱 20 万标箱，散粮 200 万吨，煤炭 900 万吨的 4 个万吨级新码头。于 1981 年建成 2 个 2 吨，1 个 3 万吨深水煤炭泊位。另外建有 10 多万平米的堆位和仓库。最初的新亚欧大陆桥标识就设立于原庙岭钓台下。标识赫然镌有："新亚欧大陆桥的起点就在这里"。

（通讯地址：海州区郁洲南路 169 号景山秀水 2 期 d3-4-101）

责任编辑　张伟敏

# 栖云山之名探源

蒋金明

云台山脉是由南云台山、中云台山、北云台山组成。中云台山是整个云台山的重要山体之一，由高埠山、推磨顶山、栖云山、黄岭山、华盖山五个山体联合组成，成为中云台山主体。其中栖云山因山体高又长，所以又是这五座山的主要山体。栖云山上有座蓑衣庵，群众习惯又称之为“蓑衣山”。

栖云山，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所见中云台山资料中，多为“溪云山”。那么，到底叫“栖云山”，还是叫“溪云山”?

先说“溪云山”。中云台山东西长 7.5 千米，整个山体都不太高，只有推磨顶山有 300 米，溪云山 287 米。大多山体在 200 米以下，南北山体较陡，整个中云台山没有特别的山溪，因山体矮小又陡，雨后溪水没几天即断流。因此，没有有名的溪，无从溪名之山。还有人认为山上时有云雾行如流水，这种行云步雾是南北云台山常有的云雾现象，中云台山有云雾移动现象不足为奇，更不能以此定名。

再说“栖云山”。栖云山，意为云雾栖于山岗。地方老百姓对山上云雾多年观察有这样结论：栖云山顶与推磨顶拉云雾，又叫两山顶搭桥，近期必有雨。如果中云台山顶与南大岛山拉大桥云雾，近几天必有大雨。山体随时栖有云雾呈拉桥状成为栖云山常规状态。

清《嘉庆海州志》“栖云山”条目：《太平寰宇记》：“在东海县东北四十一里，即巨平山之北岭。”说栖云山在“巨平山之北岭”。调查中云民众不知“巨平山”之名，哪里是“巨平山”呢?今根据《太平寰宇记》推理，栖云山是巨平山北岭，可知那巨平山就是栖云山南岭。根据栖云山与巨平山是一南一北关系。在南的一条山岭，中云人称为“秃头山”，为什么这段山体叫秃头山呢?从中云台山伸出这段山体山顶呈平型，到黄岭村南突然停止，停止的山头叫秃山头。中云地区人一般习惯称“秃头山”了。

历史上巨平山这条山早有记载，除宋《太平寰宇记》外，还有一处记载。400 多年前中云台山与北云台山之间有五羊湖，明朝隆庆年间水位较低，两山之间常有积水，令南北行人不便。1529 年云台山人刘荣出资为民修万金坊石桥，事见《重修东海万金坊石桥记》(清《嘉庆海州志》599 页)：“去东海城东北七十里，介巨平、平山之间，有积水焉。当夏秋之交，水脉于海，淼为巨浸。”石桥记中明白说石桥是“巨平山”与“平山”之间，平山在北云台山，巨平山应在中云台山处。可是中云台山中少见有巨平山记载。如果说石桥是从南云台山朝阳地区巨平山向平山修石桥，这和五羊湖地理位置差距太大；也不可能从朝阳刘巷村巨平山顺沿今港城大道至朝阳娘娘庙向东至黄九堰再到平山修二十多里路又弯又拐的石桥。《石桥记》中是从巨平山至平山间重修桥长四里，从朝阳巨平山二十多里修桥和历史事实不符，说明石桥不是从朝阳巨平山修建。

《云台新志》记载:1836 年五羊湖成为陆地。据连云区云山人回忆,海退后成为陆地时湖底呈现一条古堰基，这条古堰基是从平山的黄墓山根向南的,经今黄九堰大桥东侧附近,延伸至华盖山山根。后来就是南北通道,回忆人说且看过平山黄墓处向南路有一处一处的长条石。从云山人介绍可知,一处一处的长条石,应是明朝修的“石桥坊” 毁灭后的遗物。“万金坊石桥”是从平山下黄墓山根向南修筑,《石桥记》中“巨平山”应在平山对面的中云台山中。“平山”对面是华盖山和黄泥岭,从华盖山向东至部队打靶场转向东南，止于黄岭村秃山头处,此段山体有 3 千米。山体顶部平坦部分较长,这里应是石桥记中的“巨平山”。 这段山体呈西北东南走向。此山体古人为何称“巨平山”呢? 北云台山中的平山的山顶有 300 多米长是平型的,称为“平山”,在五羊路 BRT 车站处就可望得清楚。而华盖山东侧至黄岭村南秃山头有约 3 千米长的平山顶,应是古人将这条平顶山脊与平山之顶比较可谓 “巨平”也。

从华盖山东侧向东至今靶场向东分成两条略平行山岭,北为栖云山(其中包括马耳峰),南为“巨平山”。这里还要说明原蓑衣山和马耳山岭是相连一体,2007 年地方开山,将山体切断,美丽山体被毁。在宋代和明朝早以将秃头山称为“巨平山”。后来为什么地方人对秃头山不称呼巨平山呢?秃头山在诸朝村北、黄岭村西,诸朝人称“后山”,黄岭人称“西山”。所以地方人依诸朝、黄岭人的称谓山名,时间长就把历史中“巨平山”给忘却了。

巨平山位置确立,《太平寰宇记》云:栖云山为“巨平山北岭”,这样的说法与地形地理相符,再一次说明栖云山确立在中云台山是正确的。

《南齐书·明僧绍传》:“僧绍之郁洲,住弇榆山栖云精舍。是此山古名弇榆也。”从南齐书中得知,南北朝时云台山仍称郁洲;栖云山在南北朝时还叫弇榆山。

分析栖云山古名。栖云山古名为什么叫“弇榆山”? 先查出“弇”“榆”两字是什么含义? 查许多字典解释“弇”是“复盖,遮蔽”或“盖”的意思。榆,为榆树或榆木。从字义连贯分析,古人将栖云山呼“弇榆山”,古时的栖云山有榆树生长或榆树立成林吗?什么能“遮盖”树林呢? 这里说的是山体,那只有云雾才能遮盖山体。云雾遮盖山上榆树林,古人渐渐称此山为弇榆山。弇榆山之名是自然现象的总结,所以栖云山古名为弇榆山。今分析栖云山之名也充分体现远古时弇榆之意。

人们会问:栖云山古时有大片榆树林吗?

为了寻找这段历史,笔者专门查找这段历史的有关资料。1986 年在中云台山南侧附近发现藤花落古城址后,考古界对此非常重视。这是一处远古时期文化遗存,距今 4000 年,是一座古双城结构遗址,引起考古界的重视与研究。

据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马春梅教授《连云港藤花落遗址地层的孢子粉记录》鉴定报告,处于龙山文化时期的藤花落区域遗址剖面中的 32 个样品进行孢子分析,经鉴定出植被 79 个品种,其中银杏、榆、桑等植物占主导地位。到藤花落龙山文化中晚期区域植被乔木和灌木中又以榆、杨、栎等成分含量较高，含有少量的银杏、松等。这就是说在 4000 年前后榆、杨等树居多,榆树多的山林人们习惯称之为榆树林。

藤花落中晚期榆树等树木生长最多,所以中云台山上的树成林即为榆树林。又据考古,藤花落古城址 4000 年前比黄海平面高出一米,所以古城是一座濒临大海的部落,4000 年前后气温比现在高出 2 度,是处于温暖时期,藤花落古城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有名的大禹治水年代。此时空气湿润,又靠近大海多云多雾,云雾常居于山岗。有榆树林之山常被云雾遮盖。“弇榆山”之名就被人们认同,栖云山古名由此而来。弇榆山山林常有聚云雾现象,至南北朝人们就直接称之为栖云之山。因此,“栖云山”之名就被沿用至今。

(作者单位:市开发区中云街道办事处)

责任编辑　张伟敏

# 南北朝义塘郡诸县治所及辖境考

孙铭

公元6世纪中叶，东魏政权曾在相当于今连云港市赣榆区中部、北部地区，设置过义塘郡，治黄郭城，下辖义塘、归义、怀仁三县，隶于南青州。继之北齐、北周时期行政区划时有调整，郡、县治所常有迁徙。然而，这些历经迁徙的郡、县故城，随着历史的变迁，久已荒圮。有的仅存有残垣断壁，有的踪迹难寻，如今只剩下一些带有“城”的村名。还原这段历史，考定这些古城遗址，对于弘扬和丰富地方文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近来笔者查阅了历代相关史料，并结合实地考察，对义塘郡及所属各县故城及疆域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 义塘郡故城考

**一、东魏义塘郡初治黄郭城。**

《魏书·地形志》云：“义塘郡，武定七年置，治黄郭城。领三县，义塘、归义、怀仁。”(武定为东魏孝静帝年号) 依记，仅能知道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所设置的义塘郡治所在黄郭城，但不知其城具体之所在。不同史籍对东魏义塘郡城的记载不一，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是民国《赣榆县续志附编》认为东魏义塘郡治所，在今赣榆区驻地青口镇之西的三城子(张城子、申城子、李城子)。

二是《大清一统志》(《海州直隶州·古迹》编入其中)义塘废郡条下载：“在赣榆县西北，近山东莒县界，即后魏黄郭戍。”

三是《赣榆县土地志》云：“东魏武定七年(549年)置义塘郡，领义塘、怀仁、归义三县，郡治黄郭城……故城在徐福镇(今改为金山镇)临马疃村东，宿山之下。”

那么，义塘郡治所黄郭城究竟在何地呢？仅凭《魏书·地形志》并不能确定地点，还要利用唐代的《元和郡县志》(以下简称《元和志》)来考定。《元和志》在怀仁县条下云：

“东南至州九十里，本汉赣榆县地，梁于此置北海郡，后魏改置义唐(唐、塘通)郡，隋开皇初废郡，移怀仁县理于此，改属海州。赣榆故城，一名盐仓城，在县北三十里，汉旧县也，属琅玡郡。”

唐代海州治朐山县，在今连云港市西南之旧海州城东；盐仓城，即汉代赣榆县城，位于今赣榆区东北海头镇盐仓城村，故城墙基仍在。《元和志》首先指出了隋朝怀仁县治所选用了后魏(东魏)义塘郡故址，不言而喻，其城后来又成为唐朝怀仁县治所。由此可知，义塘郡城与隋、唐怀仁城同为一地。然则，如果能考定隋、唐怀仁县城的位置，当然也就搞清了东魏义塘郡城的

故址。

依记，隋、唐怀仁县城东南至州 90 唐里，东北距汉代赣榆故城（盐仓城）30 里。据考证 1 唐里约合 454 米(见《中国度量衡史》)，照此折算则隋、唐之怀仁县东南至州约合现代 80 里，东北至盐仓城约合现代 27 里。按其方向和里数寻求，确有一处当地人多年口碑相传的古城遗址，它位于今赣榆区政府驻地青口镇西约 4 里的张城子、李城子、申城子（以下简称三城子）三个村之间。其中从东往西依次为张城子、李城子，申城子位于以上两村之南，三村鼎足而立。三城子东南距旧海州城约 80 里，东北距盐仓城村约 30 里，符合《元和志》所记的方位和里数，当为隋、唐怀仁县故城之所在。毫无疑问，三城子也是东魏义塘郡故城——黄郭城所在地。《大清一统志》认为东魏义塘郡故城在今赣榆区西北的山东莒县界内，《赣榆县土地志》认为东魏义塘郡故城位于今赣榆区之北 40 里的金山镇东临马疃村东，宿山之下，以上二说均与《元和志》《读史方舆纪要》所云义塘郡及隋、唐怀仁县故城与海州、盐仓城之间的方位和里数均不合，故皆不可信。

近期，笔者考之于青口镇之西的三城子，未见任何古城遗迹，也未闻有何文物出土。那么，这座历经数朝的古城废置于何时而致旧迹已泯了呢？对此，《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作出了明确地解答。《纪要》在怀仁废县条下记曰：

“州北八十里，汉赣榆县地，宋为艾塘戍，魏于其地置黄郭戍。梁得其地，置南北二青州于此。（《纪要》此说有误，梁承袭宋、齐，侨置二青州仍在郁洲）。东魏武定七年又改置义塘郡、怀仁等县，寻并义塘县入怀仁。隋初废郡，属海州，唐因之，南唐又移怀仁县入赣榆城，而故城遂废。”

《纪要》成书于清代，所记海州北 80 里（相当于今一市里等于 500 米）的怀仁废城，即是《元和志》所云海州西北 90 唐里的隋、唐怀仁县城。因不同时代计量不同，实则同指一地，即是青口镇驻地西 4 里的三城子。那么，为何又称之为怀仁废城呢？因为继唐以后“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政权南唐占据今赣榆地，将隋、唐时期所置的怀仁县城从三城子迁至旧赣榆城（即今青口镇西北 12 里的赣马镇政府所在地城里村，以下简称城里村），所以其旧城便被称为怀仁废城了。另外，《纪要》不仅与《元和志》同样指出了隋、唐怀仁县治所选用了东魏义塘郡故址，而且还详细地记述了其城的历史沿革，如隋、唐之怀仁城，属汉代赣榆县地，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政权于此置艾塘戍，魏于其地置黄郭戍，东魏武定七年（549 年）设置义塘郡治于此而建黄郭城。隋初废义塘郡入怀仁县并治于此，属海州管辖，唐因隋制，南唐移怀仁县治城里村，从此一座历经东魏、隋、唐长达 300 多年的历史古城便成为废城。岁月无情，曾经的三朝古城经受 1000 多年的风雨剥蚀，沧桑巨变，如今已踪迹全无。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南唐将怀仁县移至城里村后，宋因（南）唐制，怀仁县仍治此。金大定七年，金朝政权改怀仁县为赣榆县（复汉旧名），治所还在城里村，至元、明、清不变。因《纪要》成书于清代，故谓南唐又移怀仁县入赣榆城。《中国历史地图集》（1982 年版）第五册，（隋）5—6 幅，（唐）44—45 幅，都将怀仁县城标示在今赣榆区驻地青口镇西北 12 里的城里村，如此标示显然与《纪要》所记不合，原因是编者忽略了南唐怀仁县迁治的史实，误将迁治后的南唐、宋时期的怀仁县治所，及金、元、明、清时期的赣榆县治所认定为隋、唐时期的怀仁县城了，今应予纠正之。

然而，仅凭怀仁县城、海州城、汉盐仓城间的距离，来推定隋、唐的怀仁县在三城子，证据当然不够充分。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还必须考察一下三城子的地理环境，是否可以相当。据张传藻先生考证，约距 4800 年以前，在青口镇西 4 里的三城子南与海州之间有一片方圆百里的大湖，名为艾塘湖。艾塘湖北岸大约到青口及其西的三城子，西岸至城西镇的寺后村，西南岸至沙河镇的的城子村，南及海州北的浦南镇。东面则是贯通南北的一条数十里长的沙堤隔着大海。无独有偶，《中国历史地图集》（1982 年第一版）第四册第 25—26 幅，也将艾塘湖标示在今海州与赣榆区青口镇及三城子之间。张传藻先生在《江苏北部海岸与湖泊的演变》一书中说：“通过多次调查，在古艾塘湖四周分布不少古

城遗址，如北岸的‘张城子’‘申城子’‘李城子’……”那么三城子的历史环境如何？公元八世纪中叶，唐代大诗人刘长卿到过海州及怀仁县，其一首诗题为《宿怀仁县南湖寄东海荀处士》的诗中云：

向夕敛微雨，晴开湖上天。
离人正惆怅，新月愁婵娟。
伫立白沙曲，相思沧海边。
浮云自来去，此意谁能传。
一水不相见，千峰随客船。
寒塘起孤雁，秋色分盐田。
时复一回首，忆君如眼前。

这是刘长卿任转运使判官时期，曾夜游艾塘湖，有感而发所作的一首诗。诗人仅用 70 个字生动而逼真地再现了当时艾塘湖的地理环境及怀仁县的地理位置。如“南湖”指的就是艾塘湖，“白沙曲”指的是湖边滨海砂堤，“一水不相见”表明海州和怀仁县之间隔着一湾湖水。根据此诗，可以还原大诗人刘长卿的行径，即他在夜幕降临，一轮新月升起时，乘船自艾塘湖南岸的海州出发，一路北上直至艾塘湖北岸的怀仁城，下船登岸入城夜宿于该城，从而完成上述留传千古的诗作。民国《赣榆县续志附编》（以下简称《附编》）将上述刘诗与《元和志》、《纪要》联系起来综合考证，结论如下：“按，隋、唐怀仁县治所即刘宋艾塘戍，魏黄郭戍，（东）魏义塘郡、县治所，诸书可据，其城所在，以《元和志》东北至盐仓城三十里之说考之，当即今城子村（张城子、申城子、李城子）。县治（城里村）南迤东，青口以西四里许，三村鼎足，据古掘头河之冲者也，河南入湖意即古艾塘。唐刘长卿《宿怀仁县寄东海荀处士》，诗有‘晴开湖上天，寒塘起孤雁’，亦是一证也。笔者认为《附编》将隋、唐怀仁县城及东魏义塘郡、县城定点在青口镇之西的三城子是可信的，惟城已无迹，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东魏义塘郡辖境，按《魏书·地形志》关于义塘郡所辖的“怀仁，有吴山、莒城、魏山（魏山盖即今赣榆之西的夹山，下文专作考证），归义有卢山、盐仓”的记载，可以大致推定，它北抵吴山、卢山，南限艾塘湖，东濒海州湾，西达夹山，其范围包括今赣榆中部及北部地区。《中国历史地图集》（1982 年第一版）第四册第 65—66 幅，也将义塘郡之辖境明确地画在上述范围内，并且将其治所黄郭城标示在青口镇政府驻地之西，定点位置恰在其西约 4 里的三城子处。

义塘郡濒艾塘湖而建，显然其名取自于湖。那么，为何不取名为艾塘郡呢？因南北朝时地名命名多以“取其嘉名”为原则，“嘉名”亦称“美名”，以此原则所定之地名，通常被称作美愿地名。北魏时“道武帝登恒山郡城，北望安乐垒，嘉其美名，遂移理之。反过来说，若地名不嘉，则可改以嘉名。若郡名取“艾塘”显然不如“义塘”之名嘉，故东魏取“义塘”以名郡、县，故义塘郡、义塘县以此而得名，艾塘湖也因之而又被称为义塘湖。另从义塘郡所领之“怀仁”“归义”两县之名来看，显然都是“取其嘉名”而形成的美愿地名。

东魏义塘郡的故址已考证如上。然则，东魏政权为何选择三城子之地筑城、设郡，可见当时该地定有可取之处。因为任何一个地方能发展成为一座城邑，绝不是无条件的。今青口镇之西三城子，在南北朝时期，其地位处艾塘湖北岸，南濒艾塘湖与古海州隔湖相望，去东 4 里的青口（是小沙河的入海口）临海，在海州与青口之间惟靠艾塘湖与大海中间的一条数十里长的沙堤相连通。这条陆道向北通向齐鲁大地，向南可至江淮平原，自然成为相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南北朝时期，时任北魏徐州刺史的卢昶，曾上书北魏宣武帝，欲取朐山城（今海州城），安置戍边。魏宣武帝虽然下诏同意了他的主张，但又诫之曰：“如闻东唐陆道甚狭，一轨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据之，以断军路。若已如此，更设何策。”上文所云的东唐（唐、塘通），显然是指艾塘湖，东塘的陆道即艾塘湖与大海之间的南北通道。依记，东塘的陆道很狭窄，路面仅容一个车身，两边尽是大水，南朝大军必然占据此地以阻挡大军之路。可见魏宣武帝对艾塘湖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关注。今三城子一带当时正处于这条军事通道的北端，扼南北之咽喉，自然是南北政权所必争必守之地。对此《纪要》说的最为详

细。它在怀仁废县(即东魏义塘郡故城)条下云:“宋为艾塘戍,泰始三年(467年)垣崇祖戍朐山(今海州),魏人来袭,戍者皆下船欲走,崇祖绐之曰:‘艾塘义人已得破贼。’谓此也。魏于其地置黄郭戍。齐建武四年(497年)黄昙纷以万余人攻魏南青州黄郭戍,为戍主崔僧渊所败,举军皆没。”以上所记两次军事行动,前者是南朝宋政权占据艾塘戍,后者是北朝魏政权占领黄郭戍,作为艾塘戍与黄郭戍的三城子之地,谁据之便可取得军事主动权,战略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了。由是观之,三城子之地当时不仅位处要冲,当然也是宜人居住之地,故东魏政权于此筑城建郡,隋、唐继之于此作为怀仁县治所。

**二、北齐义塘郡迁治古辟阳城**

义塘郡设置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治黄郭城,而武定八年(550年),高洋便篡位自立,建号齐,改元天保,史称北齐,故此义塘郡设置于东魏末期。《太平寰宇记》怀仁县故城条下云:“郡县俱移就高密郡莒县界置,在古辟阳城。”可见义塘郡治迁徙应在北齐统治时期。北齐天保八年,高洋大规模地裁撤州、郡,调整行政区划,估计应是此时将义塘郡迁治于古辟阳城。郦道元《水经·沭水注》云:“沭水又南,与葛陂水会,水发三柱山,西南流经辟土城南,世谓之辟阳城。”乾隆《山东通志·古迹》云:“辟阳城在莒州西南境,今之葛沟。”山东省《莒南县地名志》云:“义塘郡治所(古辟阳城)在今莒南县(1941年由莒县分出)大店镇西南三里。”

## 怀仁县故城考

**一、初置之怀仁城**

《魏书·地形志》云:“怀仁,武定七年置,有吴山、莒城、魏山。”受条件限制,古人还不能像现代这样广泛绘制使用地图,所以通常用自然实体中的山、水,或者选择古代名城作为地理座标,以标识政区的辖境。吴山位于今赣榆区西北黑林镇,北临山东省莒南县。此山海拔364.4米,是今赣榆区境内最高的山。莒城遗址位于赣榆区中西部的塔山镇驻地土城村。据尹钧科先生考证,此地曾是春秋莒国三都之一的渠丘之所在,目前仍存留西南角、东南角、东北角三段城墙。唯魏山需稍加考证。“魏山”,今赣榆区境内及周边地区都没有叫此名的山。唐杜佑《通典》在怀仁条下云:“东魏置义塘郡。有夹山,齐鲁会处。”夹山,又名夹谷山,位于今赣榆区西稍偏北的班庄镇境内,此山因春秋时期齐鲁两国在此会盟而闻名。依记,夹山曾是东魏义塘郡辖境内的一座山。此山位于莒城西,吴山之西南。两“山”一“城”三角鼎足而立于今赣榆区的西北境,疑夹谷山就是《魏书·地形志》所云的魏山。那么,东魏怀仁县故城必定离此不远。《太平寰宇记》云:“怀仁故城在怀仁县西二十三里。按后魏地形志云:‘武定七年置,属义塘郡。’”上文之前所云的怀仁故城是指东魏武定七年所置的怀仁城,因北齐时移置莒县界内之古辟阳城,故称其为怀仁故城。之后所说的怀仁县,指的是宋代怀仁县(《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宋),治今赣马镇城里村。依记,可知东魏怀仁县治所在城里村西二十三里,《大清一统志》也从此说。如按方位和里距测算,今城头镇驻地城头村,东距城里村约三十里,离吴山、莒城 、夹山(魏山)都不远,当为东魏怀仁县故城之所在。光绪《赣榆县志》说:“今城头镇有废城遗址。”《赣榆文史资料》第四辑《城头镇》一文在介绍城头名称由来时说:“城头原有古城遗址,已年久倾圮,仍有遗基,在清乾隆三年,曾做修葺,清宣统二年,绅士王尧武又在古城基上筑起了土围子,防御土匪。”据当地民间口碑流传,因为这里是所建的第一座怀仁城,后该城北迁,另立怀仁城,此地故有“头城”之称,后演变为城头。按地望推断,东魏怀仁县的辖境大致包括今赣榆区中西部、西北部地区,即今城头镇、塔山镇、班庄镇、黑林镇、厉庄镇、金山镇所包含的地域。

**二、迁徙的怀仁城**

《太平寰宇记》在怀仁故城条下云:“郡县俱移就高密郡莒县界内置,在古辟阳城。”依记,可见北齐时,怀仁县与义塘郡一同移入高密郡莒县的古辟阳城,怀仁县成为义塘郡的附郭县。笔者认为,北齐之所以能移义塘郡治古辟阳城,是因为当时莒县境内的古辟阳城应包含在怀仁县境内,否则,辟阳城之地便是怀仁县的飞地,无法成为义塘郡的附郭

城。已知义塘郡所领三县中，怀仁县之北境与莒县辖境相接，虽然县境内有吴山、魏山，但也没有界定此二山是两县的界山，此时怀仁县北部与莒县的边界很难说清楚。因此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东魏时的怀仁县并理于包括古辟阳城在内的莒县界内，二是东魏怀仁县北部边界未至莒县界内，而是县治北移后其辖境北扩至莒县境内。总之，北齐怀仁县迁治时，其辖境之北部边界必至莒县界内，所以才有可能出现义塘郡、怀仁县同治古辟阳城之事。北周沿袭北齐之怀仁县建制不变，直至隋初。可见北齐、北周时期的怀仁县之辖境应包括今莒南县及今赣榆区中西部及西北部的一片区域。

三、合并后的怀仁城

隋开皇三年（583 年），隋文帝杨坚正式裁废郡一级，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统县二级制。《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隋代卷）云：开皇三年“莒州废原义塘郡之归义、义塘 2 县，又以怀仁县改隶海州。海州又废武陵郡之上鲜（今赣榆区南）、洛要（今赣榆区东南）2 县，并有莒州之怀仁来属。”依记，可见隋之怀仁县，是由莒州原义塘郡所辖的义塘、归义、怀仁 3 县与海州原武陵郡所辖的上鲜、洛要 2 县合并而成。合并后的怀仁县之辖境相当于今赣榆区全境。隋怀仁县治黄郭城，在今青口镇驻地西三城子，前文已证，在此不赘。

归义县故城考证

《魏书·地形志》云：“归义，武定七年置。有卢山、盐仓。”卢山位于是今赣榆区东北石桥镇境内，盐仓即为《元和郡县志》所云的位于怀仁废城（隋唐怀仁县城，东魏义塘郡故城）东北 30 里的汉代赣榆县故城盐仓城。依其地望推断，归义县辖境大致包括今赣榆东北部地区，相当于今海头镇、石桥镇、柘汪镇的地域。归义县治所应在其区域内。《太平寰宇记》云：“归义城，在县北二十五里。”《大清一统志》也云：“归义故城，在赣榆县北。”需要说明的是，前者说的县为宋代怀仁县，后者所说的是清代赣榆县，虽县名不同，但其辖境相同，且二者治所皆在赣马镇城里村。按城里村北 25 里之内实无其他故城遗址可考，只有盐仓城。盐仓城是汉代赣榆县城，西晋移治艾不城。《魏书·地形志》既云归义县有盐仓城，可见此城于南北朝时尚在，东魏利用此旧城改造作为归义县治所是能够说得通的。北齐将义塘郡、怀仁县均移治莒县界内古辟阳城，而归义城未移，直至隋初省并。

义塘县故城考

《魏书·地形志》云：“义塘，武定七年置。”此义塘县为义塘郡首县，当为义塘郡治所之县，即义塘县与义塘郡同治黄郭城。义塘县作为义塘郡附郭县，其名显然与郡名同源于艾塘湖取其嘉名而得之。北齐时，《太平寰宇记》怀仁故城条下云：“郡县俱移治高密郡莒县界内置，在古辟阳城。”这里所说的郡县俱移至黄郭城，指的是义塘郡与怀仁县治所同时移至莒县境内的的古辟阳城，也就是说此时怀仁县是义塘郡的附郭县，而义塘县未移，仍治黄郭城，直至隋初并入怀仁县。按义塘县之地望考之，其辖境应位于今赣榆区的中东部地区，大致包括今青口镇、城西镇、赣马镇及海头镇南部的一片区域内。而民国《重修莒县志·古迹》云：“当时移治置莒境古辟阳城者，惟义塘郡与怀仁县，以怀仁县为附郭，元魏所置义塘县盖已废。”此说显属臆测，况义塘郡与怀仁县同时移治古辟阳城，怀仁县成为附郭县，属于正常的区划调整，并非只有同名县才能作为附郭县，故义塘县无须废省。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东魏义塘郡治黄郭城，其故址在今赣榆区青口镇之西 4 里的三城子。北齐、北周之义塘郡治古辟阳城，位于今山东省莒南县大店镇西南 3 里。东魏怀仁县治所在今城头镇驻地城头村。北齐、北周至隋初之怀仁县为义塘郡的附郭县，治古辟阳城。东魏义塘县为义塘郡附郭县，治黄郭城。北齐义塘郡治所北迁，而义塘县历北齐、北周、隋初数朝均治黄郭城。归义县历东魏、北齐、北周及隋初数朝，均治盐仓城。

（作者单位：赣榆区民政局）

责任编辑　张伟敏

# 历史上的济南盐场

蔡立志

济南在山东，为一内陆城市，并不靠海；其南北也无盐矿，济南盐场之名又从何而来呢？事实上，济南盐场不在山东，而在江苏。

江苏省的海盐历史，从有文字记载可追溯到西汉，吴王刘濞在今扬州（时称广陵）一带煮海为盐。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的竹简记录东汉时期连云港市境内有北蒲、伊芦、郁州三盐场。这些记载均已有2000多年历史。历史上盐的税利收入曾达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而两淮盐税又占全国盐税之首。清代两淮盐税收入占到全国盐税收入的一半以上，古称："煮海之利，重于东南，两淮为最"。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于现盐城地设盐渎县专管产盐的亭户。唐代盐铁吏刘晏在涟水设海口场。宋代朝廷在通州设丰利监、泰州设海陵监、楚州设盐城监、海州设板浦场和洛要场。元代，随着新滩的不断淤现，淮北盐区扩建了板浦场，兴建了临洪场。当时两淮计有吕四、余东、余中、何垛、西亭、金沙、石港、掘港、丰利、马圩、拼茶、百斜、富渎、板浦、临洪和徐渎等29个盐场，其中淮南26场、淮北3场。明代共有30个盐场，其中淮北有5场、淮南有25场。清代淮南开始衰退，淮北开始兴盛。乾隆元年（1736年）全省共有23场，淮北有板浦、临兴、中正3场。到光绪年间，两淮有盐场17，其中淮北3场，淮南14场。由此可以看出，自元代到清末，淮南盐场由26场减至14场，减少了近一半，淮北3场仍然保持3场。

为何淮南盐场数逐渐减少呢？究其原因，乃因为海淤沙长，滩涂东渐，使许多淮南盐场远离海区，盐业生产成了无水之源。泰州的海陵监、通州的丰利监及楚州的盐城监先后消失，因此淮南盐品减少，影响了盐品市场的供需。

淮南盐场不断缩减，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已经明显地影响到淮盐的正常供应。淮盐除供应江苏省内生产、生活用盐外，还供应国内鲁、豫、皖、鄂、湘、赣等12个省，有时还出口国外。淮盐的减产严重地影响了两江地区的税收收入。身为两江总督兼盐政大臣的正白旗人端方岂能坐视不管，便集资10万吊首先在海州丰乐镇西（现灌云洋桥）铺设新池滩40份，以接济淮南销售，故名济南盐场，设场治于板浦。但由于选址低洼，常被水淹，因此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报废。虽然官办盐场失败，但众多盐商却觅得商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海州县丞汪鲁门、淮南盐商叶瀚甫在埒子口苇荡左营以东建圩21条，铺滩168份，定名同德昌公司，后改名为大德公司，设于大德七圩。宣统元年（1909年）南通状元、企业家张謇集资10万吊，委托淮南盐商徐静仁在淮北埒子口南建圩10条，铺滩80份，成立大阜公司。宣统二年（1910年）淮南盐商徐静仁集资在灌河西建圩5条，铺滩40份，开始筹办大有晋公司。民国元年（1912年）淮南盐商陆费顺、周扶九、萧云浦等人，在燕尾港建圩24条，铺滩192份，成立公济制盐公司，设于公济二圩。民

国 2 年(1913 年)海州盐商黄伯雨、周梅隐集资,于灌河西建滩 32 份,后于陈家港镇建圩 32 条,铺滩 256 份,建大源制盐公司。民国 3 年(1914 年)扬州盐商吴沛生集资于大源公司东建圩 20 条,铺滩 160 份,成立通裕公司。当年安徽盐商朱幼鸿集资,于淮河入海口套子口西建圩 20 条,铺滩 160 份,成立庆日新公司。上述七公司建成后,总投资达 370 千文。是年七公司盐商于扬州成立通泰济南场盐商会。至此,济南盐场七公司,铺建了 145 条圩子,建滩 1160 份,至民国 10 年(1921 年)平均年产量占两淮盐区的 50%,并占有淮北一半池滩,垣商 508 家,号称“淮北一巨擘”,真正实现了因淮南盐产的减少,淮北盐产接济淮南销售的目的,所以称其为济南盐场,真可谓名副其实。

民国 16 年(1927 年)后,因战事连年,政府限产,抑制发展,再加上民国 20、21 年(1931、1932 年)空前大水,盐滩工具尽毁。民国 20 年(1931 年)后缪秋杰积极改革盐务,济南盐场七公司得以复兴。至民国 25 年(1936 年)济南盐场有池滩面积 15 万亩,年产盐 13.5 万吨,场署设在陈家港。

民国 28 年(1939 年)3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盐区,在济南场设盐务所,隶属海州华中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又称华中盐业株式会社,辖大德、大阜、大有晋、大源、裕通、公济和庆日新七公司。民国 28 年(1939 年)8 月 30 日,海啸浸溢,大潮漫滩,淹没盐田、农田 60 多万亩,淹死民众 2 千多人,是连云港境内历史上危害最大的海啸。裕通、庆日新两公司宣告歇业停产,其他五公司投靠日伪,沦为汉奸资本,苟延残喘。民国 31 年(1942 年),场区大德、大阜、大有晋、工济四公司破产,由大源公司经理丁敬臣接管,并担任大德、大阜、大有晋及公济四公司经理。当年济南盐场仅产盐 4.74 万吨。

民国 33 年(1944 年)5 月 3 日,张爱萍将军率领新四军 3 师 8 旅一举攻克陈家港,灌东区域的盐场首次获得解放。民国 34 年(1945 年)8 月,新四军组建淮北盐务局。9 月,新四军将济南盐场划分为灌东盐场和灌西盐场。灌东盐场包括原大源、裕通、庆日新三公司和大有晋公司河东部分盐池;灌西盐场包括原大德、大阜、公济三公司及大有晋公司河西部分。12 月,淮北盐务局成立苏北盐垦公司,下设三个场:一场为原公济公司,二场为原大德、大阜及河西大有晋公司,三场为河东大有晋、大源公司。

民国 35 年(1946 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批准,济南盐场七公司改为济南制盐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新浦成立济南盐场七公司统一管理委员会。

民国 35 年(1946 年)11 月份,中共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派杜李同志到陈家港组建淮北盐特委,领导盐场人民进行了陈家港“四进三出”的浴血奋战。

1948 年 8 月 31 日,灌东盐区全境解放,12 月原济南盐场灌东盐区更名为灌东盐场公署,隶属淮北盐特区灌河分局。1948 年 11 月灌西盐区解放,12 月原济南盐场灌西盐区更名为灌西分场,亦隶属淮北盐特区灌河分局。从此济南盐场分为灌东、灌西两部分,两部分面积分别为 103 平方公里和 157 平方公里,济南场场名不再使用。尽管济南盐场名称已不在,但灌东盐场和灌西盐场仍属于设在陈家港的淮北盐特区领导,直到 1956 年灌东地区划归盐城市、灌西盐场划归新海连市,淮北盐特区被撤消。

从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到民国 37 年(1948 年)济南盐场场名使用了 44 年。在这期间济南场总共生产盐斤 400 多万吨,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济南盐场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曾是中共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的重要经济支柱,是当时革命军队“华东金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济南盐场虽被划分为灌东盐场和灌西盐场,但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仍然值得我们怀念和纪念。目前,在灌西盐场还留下了如济北工区、济中工区、济南工区等与济南场直接相关的地名,还有大有晋头圩、二圩、直至六圩,大阜头圩直到十圩,大德头圩直到二十二圩等许多地名。从这些地名中,人们可以粗略地看出当年济南盐场的布局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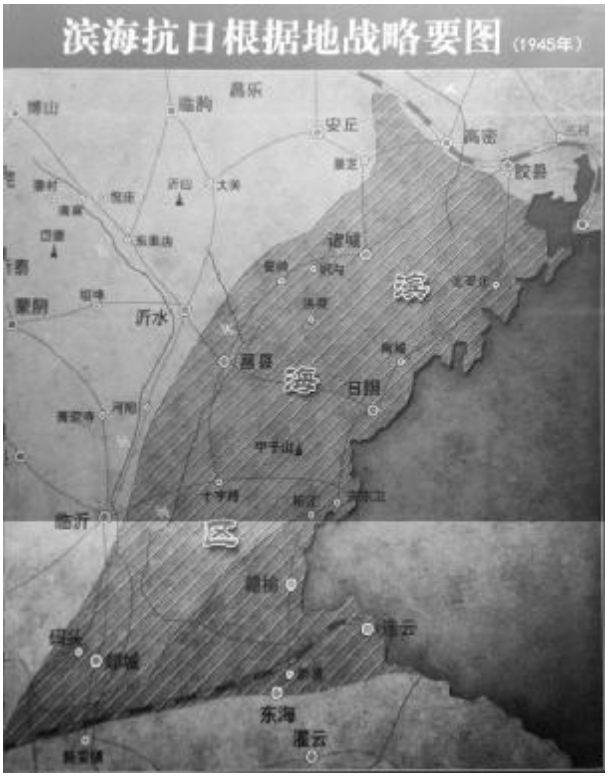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市委农工办)

责任编辑 于冰清

# 智斗顽敌保军需

## ——记滨海军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庭抗争

祝新华




滨海抗日根据地战略要图

滨海区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五大战略区之一，其政权建设是随着滨海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逐渐、壮大、完善，并发展成为鲁东南地区开展抗日战争的坚强堡垒。在解放战争初期，滨海区依然发挥着发动、组织根据地军民积极抵抗国民党反动派进攻、保护抗战胜利果实的重要作用。其中，为从上海将军用物资运回滨海根据地，滨海区工商局日(照)赣(榆)分局就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次法庭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现将有关情况略述如下。

为广开财源，保障根据地军民供需，1943 年 9 月 15 日，山东省战工会联合滨海专署，将山东省纺织局（1942 年夏，由山东省战工会在赣榆县的柘汪成立）、滨海贸税总局（1941 年，由山东省战工会与滨海专署在柘汪共同成立）、滨海盐务署（1942 年秋，由滨海专署成立）三家单位合并，成立滨海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设五个分局，其中一分局为日赣分局，设在柘汪，下辖柘汪、岚山、涛雒、相邸、黑林、碑廓、海头等税务所和公营商店。在柘汪口开设万利号商行，主管滨海区通过柘汪口对敌占区大城市和华中根据地贸易，并兼管海上秘密交通线。1945 年春，日赣分局派遣税务所长兼福永茂商行经理傅共安去上海从事地下贸易工作。从此，傅共安就像电影《五十一号兵站》里的“小老大”一样，以大商人、船老板的身份现身于上海滩，把解放区的油、花生等运到上海出售，再将上海的汽油、药品、医疗器械、电话线、纸张等和苏中的棉花之类紧缺物资，源源不断运到滨海解放区，支援山东军民打击日本侵

略者，为山东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在许世友司令员的领导和指挥下，山东已经形成胶东、滨海、沂蒙山、鲁西南、鲁北等 10 多块大小不等的解放区，山东解放军已发展到 20 余万人。但是，装备落后，有些部队就是靠大刀片和手榴弹。指战员穿的是槐树花浸染的黄土布，电器通讯设备更是寥寥无几，很多营、连单位连手摇电话机都没有。为解决军用物资极度匮乏难题，滨海区多次派出共产党员以商人的身份去上海做生意，进行经济斗争，将解放区的土产品运往上海；再从上海买进西药、枪支弹药和电讯器材，运回解放区，武装我们的部队。

1946 年 2 月，滨海区工商局日赣分局的傅共安、朱鸣高、董金梁、张风洲等 12 名共产党员，再次受滨海区党组织的派遣，率领 14 条大帆船装载着土产品进入上海，专门从事地下贸易。5 月 5 日，他们的船满载物资驶出上海董家渡码头后，在吴淞口突然被国民党保安团扣留，并抓走船上的工作人员 24 人。傅共安得知这一消息后，果断采取措施，立即疏散转移未被抓捕人员，以最大限度保存实力。当傅共安等人刚离开居住的上海寓所兴茂商行时，杀气腾腾的国民党军警便追捕而来。敌人扑空后，又去抓捕商行老板武明甫，见武明甫不在，就把他的妻子带走了。

敌人把货船拖到杨树浦，并把抓到的 7 名骨干押到上海警备司令部严刑拷打。此时，武明甫则扬言要去投案。他原是我们的同志，日伪时期被派到上海工作，曾经被捕自首过，后来又为我们做工作。假如武明甫真的投案自首，滨海区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将彻底暴露，这样不仅会失去全部物资，许多同志还会被杀害。傅共安感到形势非常严峻，必须采取一切措施，营救同志，挽救物资。8 日，傅共安在上海的河南路信泰商行找到武明甫，安慰他说："武先生不用怕，一切后果由我承担，我保证您的太太平安出狱。"随即，就利用大世界隔壁青年会五层楼上的一个房间，召集朱鸣高、董金梁等人开会，商讨营救办法。最后商定以商人的身份与敌人打官司。

会后，傅共安与武明甫来到南京路外滩由"七君子"沙千里、史良、沈钧儒等人开办的平正法律事务所。接待他俩的律师沙千里，听了傅共安的详细诉说后，即答应帮忙，还问他："法庭传你，你敢去吗？"傅共安说："当然敢去，做买卖还犯法吗？天下人做天下买卖，山东人为什么就不能做上海的买卖呢！"沙千里听后笑了："对，要传你，我跟你一块去。"

事情议妥后，沙律师随即写了份启事，并同时刊登在 11 日的《申报》《大公报》和《新闻报》上，题目是《平正法律事务所沙千里律师代表傅共安声明：福永茂帆船未装载军火及保安团吴淞区团部非法拘押船员擅扣船货之真相启事》，并讲明具体内容，经过了报关，完全合法；强调指出，保安团扣船捕人羁押 3 昼夜是不合法的；驳斥报载新闻与事实完全不符，要求警备司令部查明事实，释放船员，严令保安团放货船通行，还希望各界人士不要以讹传讹。

启事登出后的当天下午，武明甫的妻子就被释放。《大公报》刊载的新闻语气也随之一变，把"军火枪械"改为"军用品"，运往"苏北匪区"改为"江北某区"，"匪徒"改为"货客"，"法办"改为"究办"。由于形势越来越好，武明甫高兴了，不再提投案一事。与此同时，被关押的同志都十分坚强，虽遭毒打，却毫不屈服，只承认自己是船员，傅共安是船老板。加之后来滨海区派地下党员孙敬仪去做看守所长的工作，使被关押的同志生活待遇都有较好的改善。

经过沙千里律师的据理力争和滨海区地下党 50 多天的努力，官司终于打赢了，被捕及被扣的人、船、货均得到取保释放。当满载价值 1 亿元法币（相当于 100 吨花生油）军用物资的货船安全返回滨海区时，傅共安等人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为表彰其在白区对敌斗争中的特殊贡献，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领导机关，还专门授予傅共安"特等功臣"荣誉称号。

（作者单位：赣榆区政协）

责任编辑　于冰清

# 公章的由来

王 一

西汉金质官印

公章，古称官印，是行使权力的信物，故又有“印信”的别名。公章是怎么来的?又是如何发展的?

## 掌印成为掌权的代名词

从古书记载来看，官印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关于官印起源，汉代《春秋合诚图》里有这样的记载：传说尧与太尉舜坐在舟中泛游，忽然，一只凤凰飞到他们面前，将背负的图书交给尧。这图书装在一个赤玉匣子中，长三尺，宽八寸，上有黄玉检斗，用绳子捆扎，两端用泥封固，并加盖了“天赤帝符玺”的印章。这说明，印章最早是作为权力的象征出现的。

比较完备的官印制度，形成于秦代，自丞相太尉到郡守县令，都由国君在任命时授予官印，同时配发穿在印钮上的丝带，叫做“绶”，以便须臾不离地佩带在身上。

秦末，天下大乱。项梁指挥项羽砍下殷通首级，“佩其印绶”，然后便自封为新的郡守，行令各县，“得精兵八千人”。这个凭印绶当官、认印不认人的制度，又为汉朝所继承。

汉武帝时，穷得连老婆也养活不起的朱买臣忽然被任命为故乡会稽郡守。当其回到下榻的会稽郡驻京办事处时，吏员们仍把他当穷汉看待，不予理睬，直至发现他怀里揣着印绶，“坐中惊骇”，马上排好队，一起跪拜。这种观念的沿袭，便使“掌大印”“拿印把子”成为当官掌权的代名词。

印绶制度的另一特征，是以铸印材料和绶带颜色区别官阶。如汉代，丞相太尉一级高官，金印紫绶；御史大夫及两千石以上，银印青绶；六百石以上，铜印黑绶；二百石以上，铜印黄绶。从晋代起，印绶制又改为印囊制，绶囊用皮革制成，盛进官印后佩在腰间，以绣缕区别官阶。

刘邦微时所干的乡亭小吏，倒也有“五两之纶，半通之铜”的一方小印。所谓“半通”，是相对于“全

通”而言的:汉制,凡二百石以上的官印,“皆为通官印”,意思是具有发号施令的法律效力,“半通”,就当做具有一半法律效力来理解了。所以,刘邦领一个泗水亭长的“半通之铜”佩在腰间,摇来晃去,也挺神气。

### 从官员之印到官府之印

当时人对官印的理解是官员之印,而非官府之印。印绶由官员随身佩带,除非因犯法、罢官等缘故例应追缴外,升官调职或告老病殁,都可带走。中央因某个治事官职有缺而另授新官时,通常总是另铸新印,所以官印上的文字书写不可能长期保持统一。

这种一官一印的颁授办法,一直到南朝宋时,才有尚书左丞孔琳之上书提出质疑。他说,既然皇帝公侯的玉玺都是历代递用,并不使人怀疑他们是否拥有行使权力的资格,地位卑下的臣僚又何必非要把印绶佩在身上呢?宋武帝刘裕提倡节俭是出名的,便采纳了这个建议。“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印移交制度,大抵就是从那个时候逐渐形成的。这种制度行之既久,给世人所带来的观念上的转变,就是官印乃某个部门某级机关行使权力的信物,这就同现代的“公章”概念贯通了,虽然在习惯上仍旧以“摘印”来指称罢官。

依循这种新的理念,更趋完备的官印制度的创立,应该说是发生在唐代。有个这样的例子:西晋赵王司马伦称帝时,为“取悦人情”,凡当年报名应试贤良方正、孝廉良将等文武各科的生员和 16 岁以上的太学生,以及各地州郡来京出差的吏员,一律免试授官,难以计数的官员,一概赐印,“金银冶铸,不给于印”,只好用木刻印章代替一时奇缺的金银铜材,舆论乃有“白板之侯”的取笑(《晋中兴书》)。

但是到唐初政体肇建时,作为中央最高政令执行机关的尚书省,只有总办公署(称都省或都堂)和吏、兵两部有印,其余各部司都用尚书省的印信发遣公事。因为官印只代表官府权力,而非官职,连左右仆射、侍郎郎中这等内阁首相、部长、司长一级的高官,也无官印佩带。直到武则天当国时,体制改革,各部司的行政独立性加强,尚书省二十四司才分别置印。

相似的情况在其他部门也存在。唐德宗时薛之舆任谏议大夫,是隶属中书门下的正四品高官。因为并非一级行政机构,也无印信。薛以保密为由打报告给皇帝:“谏官所上封章,事皆机密,每进一封,须门下、中书两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请别铸谏院印,须免漏泄。”这话听起来像是伸手讨权,还含有同中书门下闹独立性的意思。未几,此人被平调到中央大学做校长助理(国子司业)。

自德宗以后,内参密命,职权加重,号称“内相”,最终形成了与中书舍人分掌“内制”“外制”的格局,作为一种标志,便是在宪宗初年的翰林院单独置印。官印脱离个人职级而完全成为施政机关的公章,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从此,政出多元、职司重叠的麻烦大为减少。

### 印制规格从唐朝起趋于周密

说到官印的规格,也有一个从紊乱到齐整的整饬过程。《古玺汇编》中战国时的官印,一颗编号为 0007 的“君之信玺”的边长才两厘米半,另一颗编号为 0227 的“左禀”印章的边长,倒有三厘米。再看《封泥汇编》中的两汉官印,不仅低级官印比高级官印大得多,其印面形制也“百花齐放”,有的极为方正,有的近似长方,有的四角呈弧形,还有圆形和椭圆形的,估计多为因材治印,逮到一块什么样的材料便做成什么样的印面。

至于印文的书写以及自左分行还是自右分行的排列方式,同样是五花八门,无章可循。当它们以整体形状出现时,固然可从金银材质、青黑绶色上区别规格,但一旦以封押形式反映在公文上,如非十分熟悉,困惑是无可避免的。

贾谊著《治安策》,揭述矫伪者诈取国库近十万石粮食,冒征六百余万钱赋,骗乘官车驿传郡国,应该说都与这些印制上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在形形色色的官印到处都是,甚至连离任或去世者曾经用过的官印也依然存在于世间的情况下,只要有人胆敢妄为,辨别真伪还真不容易。

从官印设置从严控制的唐代起，印制规格也趋向周密。诸司之印一律用铜铸，印体为正方形。此外，官印上有把柄以方便钤印的形制，即所谓“印把子”，也是在这个时候推行的。明代，各衙门印信俱由礼部铸印局统一刻制，且有详细的铸、换、辨、验条例，“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铸印局辨其印信真伪”。

当然也不能说这样一来便能彻底杜绝诈伪，比如《儒林外史》第十九回中那位在浙江布政司当差的吏目潘三爷，为帮助财主掠买妇女捞取酬谢，让匡超人替他捏造一纸乐清县署的公文，“家里有的是豆腐干刻的假印，取来用上”。不过这些花样只能在基层玩弄，而且是在里外勾结的条件下生效，要想去设有铸印局可辨真伪的京师行骗，就不那么容易了。

### 唐代起官印保管在府

官印的谨慎设置和保管，历来是典章制度的重中之重。如宋代《职制律》关于机关申请置印的规定：“诸官司应铸印记，先具以某字为文，保明申所隶，再行审验，关申尚书礼部。”如因旧损需换新印者，“给讫限，当日以旧印申纳尚书礼部椎毁”，也有先锉去印面一个角，集中销毁的。作废公章仍完好保留在世间这种事情，绝对不允许发生。官印的保管方式，在秦汉魏晋一官一印的时代，各自随身佩带，朝夕不离。唐代起，印为机关公章，保管在府。

官印的使用程式及责任人员，也有严格规定。以唐代中书门下即政事堂的“堂印”为例，凡需要用印的公文，必须经主管长官判署、签押，并经誊写、校对后，再由“堂头”（相当于政事堂的办公厅主任）审核，审核无误后，方可盖印。

明朝宣德年间，御史李浚奉命赴浙江钱塘县督办粮储事宜。当地的县令是个阴险狡诈之辈，准备暗中设计陷害李浚。一次，县令将自己的一名心腹安插到李浚身边做仆役，仆役伺机偷走了官印。当李浚办公用印时才发现官印被盗，经前思后想，他判断官印被盗定与县令脱不了干系。

为找回官印，李浚的属下提出带人到县令府中搜查，被其当即阻止。因为这本是件没有确凿证据的事儿，若兴师动众闹得满城风雨，极有可能逼迫对方将赃物隐藏得更深或干脆销赃灭迹。冷静下来，李浚拿定了主意。他盛情邀请县令来府中摆宴庆贺。正当两人酒酣耳熟之际，院内浓烟突起，仆人惊慌通报，家中着火。李浚连忙起身进密室取出印盒交给县令并大声吩咐：“官印重要，请妥替保管，明日送还，眼下救火要紧……”说完不容县令推辞，离席救火而去。

自然，失火、救火都是李浚亲手导演的一场戏，火势当然不大，不久便被扑灭。而捧着空印盒回家的县令却坐卧不宁，彻夜难眠，左右为难。若明日把空印盒原样返还，很难说清自己接受时印盒里面是空的。而弄丢了上司的官印，自己吃罪不起，势必还会祸及全家。县令越想越怕，只得把那枚刚刚偷来、预谋加罪李浚的官印重新放回印盒之内，第二天他不得不小心翼翼登门将官印完璧奉还。次日清晨，当看到印盒中安放着那枚失而复得、毫发无损的官印，李浚与县令两人目光对视，心照不宣地笑了。

能做到如此谨慎，自然是达到了“印记不得委其胥吏”的要求。也因此，公章也逐渐给地方办公带来了麻烦。按照规定，各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派上计吏到京师户部汇报地方年度财政收支，经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后，方许奏销。钱谷数字如有分、毫、升、斗“轧不平”，整本财务报表便要被驳回重造。重造报表不难，难的是必须盖上原单位的官印才算合法，这样一个来回，就得多费个把月以至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了结。如此，不仅增添上计人员往返奔走的麻烦，也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手续繁琐，也逐渐成为大量使用公章的弊端。

责任编辑：张伟敏

# 锦屏山散记

韩世泳

海州朐阳门外锦屏山

## 我们叫它“南大山”

海州城南有座大山，叫锦屏山，可海州城里人都叫它“南大山”。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在海州城正南方，而且在城南诸多山体中数它最高最大。据《连云港群山概览》记载，此山最高峰为海拔 427.7 米，在整个锦屏山系诸多山头中“挺拔高耸，如鹤立鸡群”。锦屏山原本也不叫此名，古时称朐山。《史记》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朐山侧立朐县，东巡期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自此，海州朐山名闻天下。

明代天启五年（1625 年），知州翁承选因此山北麓有大涧——青龙涧，从山北流下向西流经白虎山而后入蔷薇河，遂将此山改名为“青龙山”。

到清康熙十三年（1674 年），海州知州孙明忠登游此山，觉得此山树木葱茏，山花处处，终年流水潺潺，鸟语花香，宛若一面天成之锦秀屏风立于古城之南，便将用了近 50 年的“青龙山”名改为“锦屏山”，一直沿用至今。近年，石刻文化爱好者封其灿老师等人，还在此山北麓马耳峰下“黑柜台”附近一悬崖旁的岩壁上，发现清康熙二十年（1681 年）海州知州夏惟贤题刻的“福星山”3 个大字。夏公是不是在效仿他的前任孙明忠改山名的做法，将前任所改的“锦屏山”名再改为“福星山”，想以“福星山”之寓意祝愿海州古城永远福星高照呢？今人很难说得清。但是“福星山”这个名字没有被社会认同。我们从记事起，也从未听人这样叫过它。

山河改名是常有的事，多为地方主官意愿所好或文人雅兴所致。其用意都是好的，都是取其吉祥

美好之寓意，企求一方平安兴旺，人寿年丰。然而，老百姓对家乡的山山水水，多以其方位、形象一类通俗好记、便于识别的名字叫它。就像古城新南门外的那座小山，海州老百姓因它岩石灰白，山形如虎，都叫它“白虎山”。后来有的大官以为虎为猛兽，将此山改称“白璧山”，还将“白璧山”3 个大字深刻于山的东侧山岩上。后来，两江总督陶澍来海州，看此山像老鳖，作了首《鳖头山》诗，刻于山顶上，并命名此山为“鳖头山”。但海州老百姓不管这些，千百年来一直还是叫它“白虎山”。对城南这座大山更是这样。大家祖祖辈辈，用着从这山上淌下的水，烧着这山上长的柴草。不管谁家，在院内向南一望，眼前就是这座如锦似绣的大山——南大山。俗话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海州城东临东海（今黄海），南有大山。“东海”“南山”都占着，福寿双全，是何等宝地！因此，不管你上边怎么给它改名，说得如何如何，老百姓还都叫它“南大山”，而且，把这种叫法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 马耳峰处“秦东门”

锦屏山，是值得我们海州人炫耀的一座大山。早在 2200 多年前，公元前 212 年，秦始皇东巡时“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记第六）。也就是说，古称朐山的锦屏山被明确定为大秦帝国的“东大门”，其地位何等重要！

秦始皇东巡中“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这是《史记》明文记载的史实，是毫无疑义的。而关于秦始皇究竟在“朐界中”什么地方“立石”“以为秦东门”的，却说法不一。一说，在赣榆秦山岛上；一说，在海州锦屏山上；一说，在海州孔望山上。且各有论据。

但是，从古志书和辞典上的载述看，秦始皇这个“以为秦东门”的“石”，就是“立”在我们海州城南的南大山——锦屏山上。依据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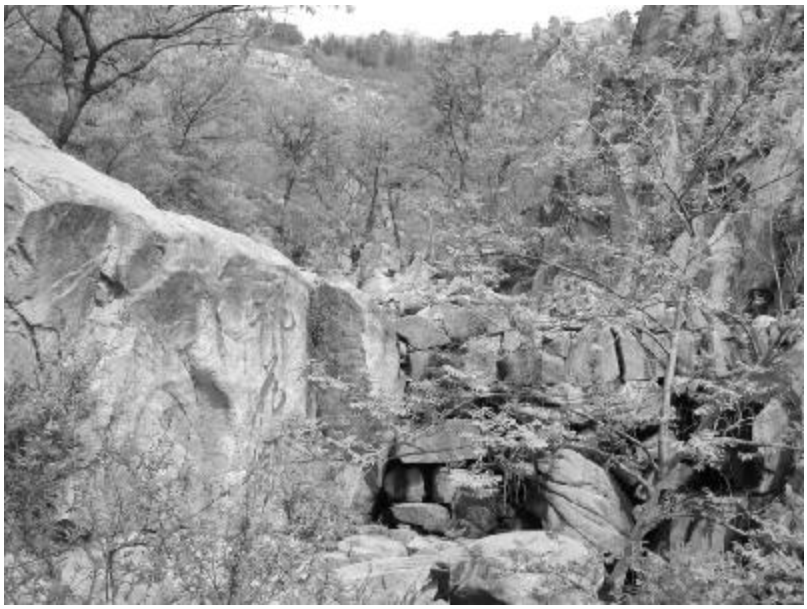
明代的《隆庆海州志》“卷之一·舆图之历代沿革”载：“海州，本春秋郯子国地。秦始置朐山县，尝立石于朐山，刻曰‘秦东门’，属薛郡。”

清代的《康熙海州志》“卷之一·舆图·历代沿革”载：“秦始皇郡县天下，始置朐山县，属薛郡，后分为郯郡。始皇刻石于朐山之巅，曰‘秦东门’。”

清代《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第二·表第一·沿革”载……《史记》始皇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

这三部古海州志都记载了秦始皇东巡至朐山，或说“尝立石于朐山，刻曰‘秦东门’”，或说“始皇刻石于朐山之巅，曰‘秦东门’”。这里所说的“朐山”，就是锦屏山。

明代万历年间淮安知府陈文烛主修的《万历淮安府志》“卷之三建置志·形胜·山川之‘海州朐山’”条说得更为具体、肯定：“州城南四里，一峰如削，俗呼为马耳峰。旁有龙潭，清甚。始皇立石其上，以为秦东门。”（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万历淮安府志》影印本第 279 页）《万历淮安府志》这段记述，很确切地告诉人们，当年秦始皇“立”的“石”，就立在马耳峰上。因为马耳峰，既像马耳，也像一幅天成的巨型门阙。



锦屏山南麓桃花涧

“以为秦东门”，是何等雄伟壮观！

权威的地名词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第 660 页“朐山”条目说：“朐山，在江苏东海县南四里，秦置朐县，以此，上有双峰如削，俗名马耳山。秦始皇东巡，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东门阙，盖在此。”说得也非常具体，非常肯切！

再从《史记》所记“立石东海上朐界中”这句话来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朐山侧立县，以朐山而定名为“朐县”，“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也可以理解为立石在东海边上的朐界中。那时，朐山也就在东海边上，为朐县的天然县界。朐山脊上马耳峰处，不就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的地方吗！

锦屏山下将军崖岩画一角

至于后来有些史料、志书上说“始皇刻石于朐山之巅，曰‘秦东门’”“尝立石于朐山，刻曰‘秦东门’”。恐怕那都是后来人“编写”的。因为《史记》中对秦始皇东巡期间在哪些地方刻碑或没刻碑，都是有明确表述的。如，嬴政“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南登琅玡，大乐之，留三月……筑琅玡台，立石刻，颂秦德，明秦意。”再如，“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其文曰……”而对三十五年秦始皇东巡至朐山时的记述，只说“在东海上朐界中立石以为秦东门”，也只是立石以为“秦东门”罢了，并无一点“刻石”的蛛丝马迹可寻。

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当年秦始皇“立石”为“秦东门”的地点，极有可能就是在锦屏山上的马耳峰处。或许，锦屏山上的马耳峰就是象征性的“秦东门”。

### 锦屏山浑身是宝

锦屏山是一座宝山，它浑身上下，从表及里到处是宝。

据《连云港群山概览》记述，“在 10 亿年前的早寒武纪，锦屏山地区为广阔的浅海，古老而大量的海底沉积物经过前震旦纪变质岩过程，形成了丰富的磷灰石磷矿藏。”锦屏山下八九千万吨的宝藏，一直沉睡着。到了 20 世纪初的民国 8 年（1919 年），人们才发现了它。曾在清王朝任过工商部左侍郎、时在民国临时政府任职的著名实业家、海州人沈云沛便联络海州一些地主、富户合股创办“锦屏公司”，在全国第一个进行磷矿开采。可是开采不到 20 年，就被日本侵略者所霸占，遭到了掠夺性开采，损失惨重，整个矿山遍体鳞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矿山生产每况愈下。

1948 年 11 月 7 日新海连解放，新海连军管会立即接管锦屏磷矿，并很快恢复生产，从此锦屏磷矿获得新生。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锦屏磷矿是全国 156 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如今耸立在锦屏山南麓半山坡上那层叠式的红色砖瓦厂房及其高高耸起的井架，就是当年亚洲第一流的、高度机械化、年产原矿 112 万吨、磷精矿粉 30 万吨的大型采运矿联合企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这里先后生产原矿石 2400 余万吨、精矿粉 600 余万吨，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锦屏山不仅地下深埋磷矿宝藏，在其山下还有大量古文化遗存。山南麓，东部酒店村曾出土一批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全新世早期古生物化石；中部桃花涧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这里更有被人们称作“东方天书”的将军崖岩画。将军崖岩画位

于桃花涧景区内，进景区大门不远处一不高的小山体上。岩画凿磨粗犷，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画面多为鸟兽、星象图、人面、鱼及农作物图案。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内知名专家到此考察，认定该岩图为约 4000 年前的宗教活动遗迹。但是，我们的先人当初凿磨这些图案究竟想表达什意思，要给后人传递什么信息，尚无人说得清，故称其为“天书”。为了破解此“天书”，市人民政府曾悬赏百万元，作为对破解“天书”者的奖励，但至今尚无人能领走这笔奖金，可见“天书”奥秘之深。

### 锦屏如画 无处不美

340 多年前，海州知州孙明忠将“青龙山”改称“锦屏山”，突显了此山特色。而古城老南门——朐阳门内门刻额“锦屏如画”四字，更是画龙点睛之作。锦屏山虽然最高峰只有 427.7 米，算不上巍峨凌空；山体也不算很大，连同山系内几个独立山体，也就是东西长 5.4 千米、南北长 4.5 千米，算不上深邃逶迤。但它小而秀气，处处有美景，无处不入画。

山之巅，以马耳峰为主的山景，古时是海州八景之一“马耳晴岚飞彩凤”。说的是濒临东海之滨的马耳峰，高耸入云，每当清晨，山顶岚气缭绕，飘忽不定，整个山头时隐时现，如彩凤朝阳，给州人带来吉祥如意。

山之南麓，桃花涧景区那片山面上，峻岩遍布，特别是那一段段火烧过似的山石，一处处墨绿色的苍松、一丛丛碧绿欲滴的翠竹，更得有涧中流水时隐时现、层层叠叠，挂于崖面……候鸟白鹭来此栖息繁衍季节，每每成群起舞，翩翩于山间时，桃花涧一带更是一幅幅天成之山水国画佳作，经常有美术爱好者和画家来此写生、创作。就连见过无数名山大川、全国闻名的国画大师钱松岩到此，也为其美景所吸引，夸其“是一幅表述国画技法的天然水墨画模”。

山之北麓，有多条发源于马耳峰的大涧，涧水从山顶流下，从海州古城之南向西流去汇入蔷薇河。其中比较出名的一条是西边的白鸽涧，因涧旁悬崖绝壁上有很多白鸽窝，成群的白鸽经常在山间飞翔而得名。白鸽涧旁有通往山南麓的山道。道路曲折迂回，时有陡坡难登。清光绪年间《朐阳纪略》作者相才在其《锦屏山记》中写道：“寻北麓上，无非窄径，绝少人踪。里许，小憩；再里，太息；勉及崇椒，吴牛喘矣。”可见当时山道之崎岖难行。现今山道虽有改善，也还是大势未变。所幸一路草木夹道，山花烂漫，时有潺潺流水绕石而过，会不时吊起人们追求美景的兴致，便不由乐在其中，脚下来劲了。另一条大涧在东边，因涧身下部宽阔，形如簸箕而得名“簸箕涧”。这条大涧直对古城老南门。城内东半部的老百姓，每年夏天都到这条大涧中的大聚乐、小聚乐、打狗巷等处去洗衣服、洗澡避暑。此涧中更有一绝色美景——仙人船。不过这“仙人船”绝非易见。因为它只出现在夏季陡雨陡晴的雷雨天之后。而且，也非每次雷雨之后都会有。它的出现必须同时具备大雨停后山间有横向浮动白云和太阳斜照之多种因素，才能一现山间。笔者有幸在一次雨后去双龙井挑水时遇到过。那天刚出老南门就见一些人朝南大山望，还有人说“仙人船，仙人船！”我便也抬头望去，只见大涧中白云飘忽，云间有一似头戴斗篷的老人立于微上翘的舢板船上，使劲地划着，忽而像云动，忽而像“船”走。不一会儿便云去“船”无。实际上这“仙人船”就是山涧中一组横卧的巨石，在浮动的白云映衬下被“动”了的瞬间美景，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仙境”。但它确实为我们的南大山增添了一笔奇幻的色彩。

锦屏如画，锦屏山就是海州大地上一座秀丽的锦屏！

（作者单位：海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

# 海州的观音道场

## ——九庵十八庙寻踪之二

孙大伟

观音庵

海州佛教文化传承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民间对观音的崇拜源远流长。在我国东部沿海包括古海州地区，观音是佛教所供奉的诸佛和菩萨中，被人们信奉最早、最普遍和与人们结缘最深的佛教神灵。早在隋唐时代，观音就已获得社会的普遍信仰，这是旧社会苦难深重的劳苦大众，对公平社会和惩恶扬善的一种崇拜。

佛教文化氛围厚重的古海州，供奉观音的道场多达五六处，虽代有兴废，但屡毁屡建，且香火旺盛。海州的观音道场，最古老的是建于南唐年间（960-975）紫竹庵位于锦屏山中，现更名为紫竹林，仍是供奉观音的道场；观音寺建于元至正三年（1343），位于古城东门内街北（久毁）；观音庵建于清代，位于双龙井之西；观音堂（东），位于古城南门内西侧，观音堂（西），位于城西停水坝之南，这两座观音堂均毁于解放前夕；三圣庵又称花园，位于海州中学北侧，毁于“文革”；观音园，位于将军崖岩画西北侧。在这些寺庙中，供奉着佛教造像艺术最为丰富的观音塑像和画像。特别是建成于 2002 年的观音园，利用千条涧两侧山坡，安放大小观音圆雕造像 72 尊，板块式深浮雕观音造像 30 尊，彩色和黑白影雕观音造像 55 尊，《妙法莲华经观音菩萨普门品》整卷图，文彩色影雕 45 尊，另建有 5 层石塔和十二生肖圆雕 1 套，总计各类观音艺术造像 202

尊，如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音、送子观音、渡海观音、吉祥观音、祥云观音、如意观音、赐寿观音等。这些造像，一般为慈爱、典雅、端庄、俊秀和雍容华贵的贵族妇女形象，左手持盛有甘露的净瓶，右手持柳枝，或趺坐于莲花宝座，或足踏祥云，还有用夸张手法塑造的“千手千眼”观音，以表现其神奇的魔力。她们都是古海州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瑰宝。

斗转星移，海州古城内的观音寺、两座观音堂和三圣庵早已不存，目前供奉观音菩萨的道场主要是观音庵。

观音庵位于海州原朐阳门（老南门）外西侧，护城河南作为城廓的一道土岭上的东端，庵门东向，北依城阙，东迎朝阳，西邻朐山书院、蜡神庙，庵东百米之处便是著名的双龙井。庵院为建于晚清的一座四合院，形制狭小，类似于民宅，三间不高的大殿内，供奉一尊观音塑像。解放后，只有一名法号宏玉、俗家姓马的老年比丘尼常住，因年岁较大，周围百姓均称其为“马奶奶”。“文化大革命”中庵院破败，后为生产队队房。

1991 年，海州区政府投资 15 万元，将位于北大街被拆迁的古佛庵并入观音庵，作为首批恢复的宗教活动场所和旅游景点，新建了 5 间大殿、山门、念佛堂、古佛殿和斋堂等建筑，庵院占地 2300 多平方米，东向庵门是正门，为观音庵。慈航普渡大殿内供奉观音菩萨及其侍者善财、龙女的装金塑像。西侧念佛堂为五开间两层楼建筑，楼下是念佛堂，神台上是西方三圣菩萨的装金塑像；楼上是接引殿，供奉的是接引佛。南向庵门为古佛庵，供奉燃灯古佛塑像。

海州观音庵恢复后，能宽法师为住持。能宽 13 岁时入空门为佛弟子，先后在云台娘娘庙等寺庙潜心向佛，持戒苦修，佛法精进。20 世纪 80 年代初落实宗教政策，能宽法师来到海州古佛庵修持，其后与能空法师等一起参与接收重建龙洞庵。古佛庵拆迁与观音庵合并重建，能宽法师偕弟子入驻观音庵。由于城市发展，已融入居民区内的观音庵紧邻中环路，交通便利，观音庵又是专门供奉救苦救难观音菩萨的道场，民间对观音的崇拜长盛不衰，香火旺盛。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圣诞、六月十九日观音成道、九月十九日观音出家等佛教节日，观音庵都举行佛事活动，信佛的四众弟子和不少普通百姓前往朝拜进香者络绎不绝，小小的四合院内钟磬声扬，佛号远播。

2006 年 11 月 20 日，93 岁高龄的能宽法师圆寂。坐化后，弟子们捡得舍利子数枚，其中较大的一枚，是观音立于莲座上的造形，上面还有一个虎头。其弟子们认为，这枚观音形象的舍利是能宽法师的化身，因其属虎，所以上有虎头，便将其作为佛门之宝，予以供奉。

能宽法师圆寂后，住持由其徒孙、苏州太仓普济寺方丈圣柱兼任。2015 年，圣柱与锦屏林场达成协议，采取产权置换方式，在孔望山景区西门北侧民俗博物馆旧址易地重建海州观音庵。重建的这座庵院占地宽广，东西宽 63 米，南北纵深 150 米，占地面积近 1 公顷。庵内建筑规划从南向北的中轴线上设山门、天王殿、观音殿、大雄宝殿、僧舍和藏经楼，另建有东配殿和长廊，共四进院落，是海州地区占地面积最大的佛教寺院。2016 年秋，新建的大雄宝殿竣工，大殿气势宏伟，东西长 27 米，进深 20 米，高 17 米。到 2016 年底，重建工程投入资金已达 197 万元。

（作者单位：海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责任编辑　邱仕明